

山 区 妇 女 口 述

华北卷

杜芳翠◎主编

大山 的 女儿

经验、
心声
和需求



贵州民族出版社

香港乐施会资助项目



山区妇女口述

大山的女儿

经验、
心声
和需求

华北卷

杜芳琴○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1 黄龙寺

2 黄龙寺村旧校舍之一（八庙台）

3 在旧校舍房后读书的女学生

4 黄龙寺新校舍





- ① 参加“幸福工程”项目的妇女听北京农大蒋教授讲课
- ② 刘书玲和包山小组的姐妹在开山栽树
- ③ 刘凤仙(右起四)、刘凤英(右起三)
- ④ 为孙子做虎头鞋的葛素梅



满城县黄龙寺村位置示意图



代 序

在农村和山区的发展工作里,工作者要聆听各种心声和要求。而最需要聆听的,往往是那些因贫困、发展的条件差异等失去声音的一群。更多的时候,其他人会选择性地聆听又甚或代言。由于妇女们的生活担子,一贯的性别角色,没信心也不习惯在公开场合发言,她们往往被视为沉默的一群。

在农村和山区的发展工作中,我们常强调发动妇女参与的重要性。妇女不应被视为任劳任怨地贡献的一群,在分配发展的资源时,妇女更不应被忽视了。妇女既像是默默无言,却又是絮絮不休,她们在劳动时,在串门子时有满肚子的话要说,自己的、孩子的、家里的、村子里的。透过小圈子的口述,辗转流传,每一趟口述就把一个个的妇女贯联起来,这群妇女来自偏远的山村,也有不同的民族,是贫苦、弱势的一群,但把她们的言语心声记录下来,这声音壮大得再不能被掩盖。

《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求》展示的正是真言实语的力量。我们聆听到的不再是她们身旁男人的代述,山区妇女直接谈及她们最熟悉、最关注、最担心又或是最有说法的事情。对山区妇女姐妹来说,她们的口述不单是一个声音,更是一个索求,把心里的话宣诸于口,本身就是一个“充权”的过程。

香港乐施会和国内山区的老百姓一起面对贫穷,共同发展,寻找出路,已进行了好几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要虚心地学习再学习,但还是聆听得不够,让我们透过这本口述结集聆听更多妇女姐妹们对生活、未来的冀望和索求,让我们通过更多更谦逊的聆

听、对话,了解和支持她们。让山区、农村的发展有更多妇女们参与和得益。我诚意推荐这本书给每一个关心国内贫困地区的人,和关心妇女处境的您。

周燕珍

乐施会中国项目统筹

1998 年 9 月 29 日

目 录

挑战贫困,告别愚昧	(1)
都富裕起来,这是咱的责任	(41)
我们家老的和少的都挺和气	(67)
人生的道路怎么这样不平坦	(91)
生活为什么这样不平坦 ——一个山村妇女的自述	(97)
反正他们得养活我	(135)
我那时死孩子死怕了	(149)
你就是一辈子,病都看不完	(156)
我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169)
我希望他问问你心里最想说的话	(178)
我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199)
过好生活全靠自己劳动	(208)
“经济沟”,这是我们的希望	(216)
有个狗就当个人似的	(233)
我就是喜欢山,我哪儿也不愿去	(247)
这会儿我特知足(Jǐ,知足)	(257)
丫头们孝顺你,你也享福	(274)
等我两个小子挣钱了,我就熬出来了	(287)
家里家外大小事情都得我去做	(294)

女的顶着“半边天”哩	(302)
俺们不怕苦,就是没本钱干点什么	(318)
现在就是想致富,就是富不起来	(329)
编后记	(335)

挑战贫困，告别愚昧

杜芳琴

一、缘起：为什么有这么一本书？

从1993年7月在天津举办首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班以后，我和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同志们便对农村妇女发展和教育培训产生了兴趣。1994~1996年，我们除了在河北省定州市（原定县）进行了“影响华北农村妇女行为方式的文化因素”课题的田野调查和妇女培训外，还与中国妇女报的“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联合举办“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研讨会。1995年秋，我突然收到这个村的女党支部书记刘凤英的一封信，信上说，因为《农家女百事通》的网络，她知道我们中心，她倾诉她与村民立志改变山村面貌，正在绿化荒山，栽植果树；还说他们确立了“治贫先治愚”的思路，“以教兴村”，筹建一座像样的教学楼，因为原先的学校将要倒塌；还有长远的兴建旅游区，兴办肉牛场，治理小流域等令人鼓舞振奋的规划。她还诚恳地邀请我们到他们的村庄毕竟寥若晨星，特别是华北农村这一“大男子主义”传统比较浓厚的地方，如何在一个乡里出现两个女性社区领导人？（1994年我们就认识了龙居村的女村长贾俊乔）。我马上写信给刘凤英，在定州的培训班上我们第一次相见，承诺如果有课题一定到她们村。由我的经历和出身形成的、随着对农村妇女研究的深入有增无减的“农村妇女情结”诸多因素促使我在1996年夏天又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农村妇女发展与文化素质教育培训研究”，这次居然在国家教育

科学“九五”规划课题中得到正式立项！这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后，我国教育界首次把妇女教育作为科学研究单独立项。但我们的课题只立项不给钱，叫做“自筹经费”。尽管这样，黄龙寺和刘凤英的吸引促使我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好在我们的研究中心一直是个“四无”（无编制、无办公室、无固定经费、无设施，但有名分）机构。碰巧的是，在我们正要着手开展新课题的田野调查时，得悉在昆明注册的香港乐施会打算去云南、贵州、广西等山区项目点上采用口述方法进行妇女发展的需求评估，定于1997年4月初举办“贫困山区妇女参与发展口述记录培训班”，我和课题组的另一名成员应邀出席。该班邀请了国内外从事妇女与环境、发展的国际口述记录专家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培训，介绍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地区运用口述方法进行妇女发展的经验，我们还到禄劝县的少数民族村寨进行实地访谈并由与会者共同参与制订适合本地情况的访谈提纲。这次活动对我们的研究视野和访谈工作非常有帮助。

用口述的方法来填补以往历史中对妇女的忽视，使妇女像其他“下属群体”一样进入主流历史和社会是妇女史学家革新历史和改善妇女状况的重要目标。口述史是针对以往文字的历史中偏重于少数男性精英的建功立业的历史、漠视大多数而做的校正。随着世界越来越趋于民主和大众文化的日渐普及，对口述史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世纪40年代以来，录音机、录像设备等的发明为口述史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前提。始而是工人口述史的兴起；随着妇女运动的开展，妇女口述史方兴未艾，成为广大妇女讲述个人成长历史提高性别觉悟的重要武器，也是妇女史学家填补妇女史或改写历史的有效的、新的途径。

口述的方法不仅用来叙述重现妇女的经验、经历，重构或填补妇女的历史，同时也被妇女研究者和发展工作者用于研究和工作的过程中。因为口述能够展现不同人的声音、表达个人的不同需

求,还能够展现社区的历史。好的发展计划应是能倾听不同人的发展的优先顺序,如果社区发展只依靠一些社区代表人物而其他人是“无声”、“沉默”的,那就得不到关于社区的完整的图画。“参与式评估”开始注意“倾听”集体的声音,然只有个人的口述才有听到真正个人的声音,了解社区更多人的需求。口述还能够提供关于社区和个体的历史——如何从过去到现在,今天的“果”与历史的“因”关系何在?割断历史的发展一定不是好的发展。

口述的进行过程是访谈者和叙述者双方的互动过程,对访谈者而言,绝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对方,相反,访谈者是来向叙述者学习和倾听的,因为只有叙述者最有资格谈自己的经验和社区的历史,她们不是被动地接受提问,更不是提供研究的素材,而是在讲述自己经历的事件过程和感受,并在讲述中建立自信心,得到更多的赋权(empowerment)机会,从而成为发展的主体。

我们正是遵循以上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去进行口述访谈的。1997~1998年春假和暑假,我们课题组5名成员曾3次到满城县和黄龙寺,得到县、乡、村各级党政、妇女组织和有关领导的支持,我们与黄龙寺的干部和村民特别是黄龙寺的妇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的真诚,她们的智慧,她们的艰苦卓绝创造美好生活的热忱,永远让我们心潮激荡!我们从她们那里学习到了在书本上课堂里永远学不到的知识和做人的真谛!她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之间的“姐妹情谊”感人肺腑!刘凤仙,这个仅有小学程度的两个孩子的母亲,用自己的血泪写成的自传,从来是秘不示人的,她却把视为“生命”的手稿交给我们。向我们倾吐的肺腑之言是一份珍贵的、任何善于描述刻划的语言文学大师都无法达到的真实和震撼!这些宝贵的妇女人生记录,既是她们经验的结晶、心声和表达,又是她们自我认识、自我赋权的开始,同时也是我们和黄龙寺妇女与所有妇女分享经验的机会。就是这样一份珍贵的资料,如果没有出版的机会,也许永远“难见天日”;欣幸的是,贵州民族出

版社愿意出版,乐施会再次“乐善好施”,使得这些普通的华北山区的汉族妇女能够和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妇女汇成一书,向世人展示她们的生活,表达她们的心声;我们应该对出版者和资助者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该书的出版还应该感谢 Olivia, Kelly 和吴玫 3 位女士,她们不远万里从国外赶来进行培训并给予其他帮助,带来了世界其他地区妇女口述的经验。

关于本书的编辑体例,限于篇幅不得不从访谈 40 人的 30 份口述材料中选取 20 份编入书中。其中单独访谈 11 例,合访和集体座谈 8 例,包括夫妇、婆(公)媳、合作小组和邻里等关系。从不同的年龄段(20~80 岁)的妇女经历来反映时代的变迁,了解不同时代的妇女不同的生存状况和不同的心声和需求;单访的形式使叙述人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而合访能在人物交往互动中观察他们真实的关系和反应,集体座谈便于在同类问题上的互相启发,更重要的在集体的谈天中容易发现社区的骨干,作为下一步培训的社区主力。我们也注意访谈一部分地位特殊的男性(如社区领导和上级机构的官员,社区的有专业特长的人员如医生以及有影响的人),作为观察妇女生存状况的一个重要的角度。

二、黄龙寺——妇女生活的自然环境和 社会人文环境

1. 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资源

黄龙寺,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西部深山区太行山东麓,东距保定市 60 公里、满城 45 公里,北与易县交接,西与顺平相邻,是满城县最偏远、最贫困的村庄,也是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山村。黄龙寺四面环山,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 401~1003 米,最高峰为玉皇垞,据传黄龙寺的村名与此峰有关。峰峦起伏、沟壑纵

横,自然形成 10 条支沟中参差错落星罗棋布着 10 个自然村。总面积为 17 平方公里(25489 亩)。其中可耕地 0.44 平方公里(664 亩),包括水浇地 0.17 平方公里(260 亩),人均耕地不足 0.0004 平方公里(0.6 亩);林地 0.49 平方公里(735 亩),宜林山场 15.55 平方公里(23320 亩),林场人均 0.014 平方公里(21 亩);村庄、道路、河流占地 0.51 平方公里(770 多亩)。这里属于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年均气温在 12.4℃,无霜期 178 天,年日照时数为 2722 小时,降水量 650 毫米,6~8 月多雨。常见的自然灾害有旱灾和风灾,历史上十年九旱。农作物以种植谷子、玉米、麦子、土豆、红薯等为主。主要植被山坡生长荆条和皂角,谷地有柿子树、花椒树和柴树等,近几年来实行山林承包,村庄附近的山场逐步被开垦栽上杏树、桃树、李树、柿子树……山上还生长有野生的药材:柴胡、荆芥、知母、远志、地黄、半夏、南星、防风、葛根、穿山龙、大红袍、艾叶、益母草……

2. 社会人文环境与社区组织结构

黄龙寺行政村由 10 多个较大的自然村(在自然村中还有小自然庄,大小共 24 个)组成,分布于南北 7.5 公里、东西 3 公里的沟坡之中。主要的自然村有:龙塘(又有 4 个小自然庄,如南边、北边等)、东娥、东娥峪、禅堂沟、苇子沟、东沟、西沟、西沟口、八亩台、北湾等,其中最大的自然村是龙塘。全村总人口 1186 人,其中男 621 人(劳力 350,学生 126,小孩 50,老人 95),女 565 人(劳力 300,学生 120,小孩 55,老人 90)。在 650 名男女劳力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青壮年男劳力外出打工,农活基本上由妇女劳力承担(从今年开始,外出口开始回流)。农业收入的粮食仅仅够维持生活。如果遇上灾年,还需政府救济。黄龙寺发展林果业的潜力巨大,村庄曾有过发展林果业的规划,但因为资金的问题,在目前只能以鼓励村民按户承包荒山开发为主。

改革开放以前，黄龙寺是一个生产大队，较大的自然村是一个小队；联产承包以后，大队成了行政村（现在妇女和村民仍习惯称村委会为“大队”），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小组，已无实质性的功能，但妇女小组的活动还较活跃。近几年来，外界组织和人员到黄龙寺从事妇女发展的项目越来越频繁，妇女小组更加活跃了，妇女在社区和家庭的重要性得到增强。自从1995年，刘凤英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她作为高中毕业生和具有现代意识的一代新女性成为社区领导的核心人物，她和她的同志团结村民，正在创造黄龙寺历史新篇章。尽管目前黄龙寺还很穷，但黄龙寺人正在向贫困和愚昧挑战；他们曾有过苦难和奋斗、仇恨与反抗的历史，同样黄龙寺人能够创造自己幸福的未来。

3. 妇女和社区变迁的历史

黄龙寺建村约有二百年的历史。最初的居民迁自山西；然至今最大的姓氏刘姓是从顺平（完县）迁来的。当时满山的葱绿，树木茂密；但是由于居民的烧柴砍伐和烧木炭，山成了秃山。现在的树都是后栽的，近年来飞机撒播植树造林和村民的承包山场，山又空前绿了起来。在这里生活的一代代居民，除了靠山吃山，也在沟壑之间、山坡之上开垦着有限的农田。在过去那些漫长的岁月中，黄龙寺人不但要与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较量，艰难创业、生存、繁衍；而且也在饱受阶级压迫、剥削和民族欺凌时奋起反抗和斗争。民主革命时期“减租减息”、“平分土地”（刘燕荣）；民族战争时期的抗日救亡、浴血奋战，几乎与每个家庭和个人发生了关系：亲人遇害（刘秀梅），热血男儿奔上了抗日前线（刘永春，李淑琴等），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刘玉珍）。至今，黄龙寺的老一代村民还能讲述当年杨成武将军率军在太行山一带战斗大捷的故事，西沟口背后高山之巅至今挺拔屹立的古柏——“消息树”，正是黄龙寺人的风骨和性格的象征。

解放后,因为是革命老区和贫困山区,用于支援建设开发和救济的投入不下千万元。70年代末通了电;1981年打了机井,开始吃井水,有了水浇地;1982年修筑通往岭西的石子路;90年代初解决了自来水入户的问题;至于每年的返销粮、救济粮(款)都是不小的数字。还有医疗卫生、妇幼保健、抚恤补助都有大量的投入。总之,这里的生存环境和条件,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改善。也有不尽人意甚至不进则退之处:如原来的公共福利的事业有的萎缩废置了,乡里电影放映队解散了,乡与村的有线广播废弃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不存了……村上发布通知、传递信息需借助于小学生,有时很误事;电话至今未通,测算需投入费用太高;农民有病必须找私人行医的诊所花钱买“洋药”吃。

贫困的黄龙寺并不封闭,而是与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通。1949年以来,国内的任何有关的运动和风潮都在这里激起了回响:合作化时妇女走出家门参加集体劳动,人民公社时“一大二公”与“吃食堂”,老一代妇女回忆起来仍激情满怀;讲述当年作为“铁姑娘”和女队长的不让须眉,至今还令她们自豪不已(葛素梅,刘巧云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60年代,“左”的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四清”、“文革”中反复“割资本主义尾巴”、反“三自一包”,现在仍在人们的口语中留下“黑包工”的特殊词汇;“赤脚医生”、“大队”等历史性的词语,在人们的谈话中难以抹去。群众运动、义务劳动式的集体动员,改革开放之初还有效地组织村民修路,男女齐动员艰苦奋斗的场面被许多亲临其境的妇女描述着(刘书玲,刘凤仙)。这条石子路便捷地沟通了黄龙寺与外界的联系,改变了过去外出步行、骑驴、牲畜拉车等传统,现在汽车可直接从黄龙寺村到满城,然后从保定通往各地。

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就是改革开放了,她牵动了家家户户、男男女女的切身利益,从最初的联产承包,继之以“打工潮”,接着是承包荒山,兴建学校,制订黄龙寺的发展蓝图……90年代是黄龙寺

发生巨变的时期：村里人从深山走向外部世界，除了打工挣钱，更重要的改变了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他们引进项目和资金，引来了更多的关注老区、关注山区妇女发展的组织与个人……杨成武等发起的“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简称老促会）成员、原水利部屈健副部长带来了水利项目和各级林业、畜牧、水利的官员和专家，县、乡各级领导，一次次来到黄龙寺，与黄龙寺人一起制订发展建设规划；大学从事妇女发展研究的教师和学生也来到这里进行“文化扶贫”的实验，中国农业大学的女教授在这里进行农村家政推广的实验，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成员来这里搞“草根”培训试点，“希望工程”、“幸福工程”、“小额信贷”、“光彩事业（扶贫）”等对这个村庄来说都是实实在在得益的事。目前，在北湾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教学楼，在老促会、中央统战部和县乡政府等组织和支持的帮助下，刘凤英和她的同事四处奔走，筹措款项，共投资 38 万元，取代了 3 处摇摇欲倒的破旧校舍。这是一个象征，是黄龙寺告别愚昧落后的象征，是现代文明和最新信息得以在此传播和驻足的象征。在向贫困宣战的事业中，从走出去打工“淘金”开始转向立足本地资源的“就地生金”，承包荒山，种植果树就是一种标志。刘凤英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我总凭直觉感觉我们黄龙寺是块风水宝地。”“黄龙寺一定有宝！”这个“宝”就是“人杰”对“地灵”的热爱、感通和共享，靠人的努力去营造适于人和自然共存共荣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环境，而不是一味像自然索取。黄龙寺现在已有 30 多户人家承包了山场，人均栽树 100 棵；就刘凤英带头承包的荒山就有 0.16 平方公里（240 亩），已栽树 6000 多棵；刘翠英在承包的两道山沟已栽种 0.12 平方公里（180 亩）果林，她在山上独居、劳作，10 多年来已得到回报；刘书玲及她的包山小组的姐妹们一镐一镐地掘土、一桶一桶地挑水浇树，在她们的“经济沟”开创……这似乎又是一个象征：妇女在创造着山区新的发展模式——一种可持续的与自然建立和谐的伙伴关系的发展。这也是改革开放到今天一

种必然趋势,也是妇女力量和觉醒的表现。

4. 告别贫困和愚昧:漫长的征途

然而,告别贫困和愚昧的征途是漫长而艰巨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恐怕后人还需在“乘凉”的同时继续“栽树”。目前,黄龙寺的发展到了关键的时期,有了目标和方向,但干起来又是那么困难重重:集体经济几乎是一个空白,公共事业无从发展;个体投入如包山植树一时还不能见到效益,在人均耕地不到0.0004平方公里(0.6亩)的情况下,靠种地仅仅能维持吃饭;打工也面临着拖欠工资的无奈,新的投入比如家庭养殖买猪、羊、兔也苦于缺少资金。尽管几年来年人均收入逐年增长(1995年400元;1996年600元,然仍在700元的乡人均收入的平均线以下),距离小康的标准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河北省“小康”的标准:1995年人均收入1300元,1996年2400元,1997年2700元)。人的素质提高更非短期奏效,村民的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据1990年的统计,全村学龄以上人口中有16.6%是文盲,45.8%只上过小学(复盲的人不少),村中的文盲和半文盲占62.4%。妇女的教育状况更不容乐观,15~40岁的妇女中有169人是文盲和半文盲,占这部分妇女的70%左右;而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文盲、半文盲只有94人,占39%;在全村40岁以下的29个文盲中,有28个是妇女(蒋爱群《对黄龙寺村调研的总结报告》)。由于缺少基本的读写和理解能力,技术培训、新观念的输入都受到限制。对下一代的教育虽然受到家长的普遍重视,然多数父母是希望孩子能离开山村到城镇就业。人才匮乏是黄龙寺发展的最大不利因素。新的社区领导正是看到这个关键问题,才下狠心不辞劳苦地四处筹资建校,正如黄龙寺旧校址标语所书:“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黄龙寺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本,“本立而道生”,黄龙寺今后的生机将勃发于她扎实的“树人工程”。

三、她们的经历与经验：工作、生活、贡献

黄龙寺妇女向我们讲述的一个个感人的人生经历再现了几代妇女生活的历史和现实的场景画面：她们的劳作与贡献、婚育家庭生活 and 社区交往以及其中的甜酸苦辣和喜怒哀乐。

1. 经济生活与两性分工：男外女内模式的因与变

(1) 分工的变化——男耕女家——男女同耕——男外出务工女留家兼营

华北农村历来是男外(农耕、小手工业和小商贩)女内(生育和家务,兼在农忙时辅助性的农田劳动)的性别分工,黄龙寺也不例外。合作化——公社化运动彻底打破了这种个体小农男耕女家的模式,成为男女同耕(但不同酬)的集体劳作的生产模式和妇女基本独担家务(包括生养孩子、事养老人和做衣做饭等)的生活模式(男人也做挑水、扫院子的重活和家中“外”活儿,当时,出工妇女的孩子往往由老年妇女——婆婆或母亲照看)。合作化以前的育龄妇女因生育多在10个左右,几乎无暇从事农田劳动,当时也没有对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的政治动员和经济机制(臧翠芝,刘燕荣)。合作化时期的当龄妇女的生育已减少到3~5个孩子,当时必须男女同挣工分才能养家糊口(葛素梅,刘巧云)。改革开放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农民的强烈的致富愿望以及灵活便利的土地经营方式使得男性青壮年农民离开家园,涌向了城市,从业于建筑、建材(砖厂)等体力繁重的部门,挣一些活钱以补家用并用以盖房、婚嫁、养老、儿女教育、丧葬、人际交往等开支和生产投入,像买化肥、农药、树种、饲养牲畜等费用;妇女则由于传统的角色分工,需要照顾家里的老小,所以便成了家庭种地、管理果树、治理家务、生养教育孩子、照顾老人集数功于一身的“顶梁

柱”，男外女内的传统分工模式现在以男外出务工女守家务农为多种经营的形式表现出来，村里半数以上的家庭是这种格局。

(2) 今日妇女：独撑家庭“一个天”

妇女承担了家庭承包责任田从种植到收获的全部过程中的主要生产环节，男人只是在麦秋两季回来帮忙。妇女既是决策者，又是操作者。农活儿、林果、养殖、种植、家务，一年四季，不得空闲。刘素萍叙述她一年的劳作：

春天，整地——上山给小树接枝——开始春播——出苗开始锄地（几遍）；夏天，锄地——收麦——施肥浇地（遇天旱要挑水）；秋天，收割——耕地整地种冬小麦；冬天，上山割柴——杀猪腌肉。

（龙塘）

寡居的刘玉珍叙述自己上山种地的情景：

种一趟，耨三趟，施化肥一趟，收一趟，耕一趟……有的时候还常去看看。种麦子还要打药，两遍不行，打三遍。（今年）棒子都旱死了，光栽棒子就栽了三遍：死一遍，栽一遍，浇一遍。

（刘玉珍）

有的妇女即使丈夫在家，也是劳动的主力。齐桂贤向我们诉说：

摊上个穷家，摊上个不会干活的丈夫，摊上个有病的公婆……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我去做：一大清早就上山割草、割柴，背那么一大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家后还要给孩子和丈夫做饭，一天的事做不清，没完没了，累极了！

（齐桂贤）

除农活外，在承包山场的 30 多户中，多数的家庭也由妇女承担。刘翠英的丈夫常年在满城县交通局带班，根本无暇照顾家里的事情；她在家中承担了 0.0017 平方公里（2.6 亩）地的耕种，还承包了离村很远的大片山场，管理几千棵果树；她把未上学的两个女孩交亲友照顾，在山沟里盖房，在那里吃、住、养鸡、喂猪、积肥，为果树施肥浇水，在一条狗的陪伴下度过了 2 年的岁月。从 1990 年

到现在,她承包的果林已经见到经济效益,成为黄龙寺妇女包山致富的榜样(刘翠英)。刘书玲和她的包山小组的姐妹,自愿组织起劳动生产单位,在丈夫外出打工的时候,她们几个妇女决定合作承包荒山;这片山位置偏远,石坚土硬,只有夏天雨季才能下镐,她们开一点儿,种一点儿;开一片,栽一片;挖一个坑,栽上一棵树;栽一棵树,浇一桶水,一年多才开 0.0013 平方公里(2 亩)荒山,栽了 100 棵柿子树。我们亲见她们一镐一镐地开山,一桶一桶地从山腰挑水浇树;她们没有钱买树苗,就从山上挖野生的小黑枣树,再嫁接成柿子树(刘书玲和包山小组)。

在黄龙寺,收获采摘农作物和林果的责任,如收玉米、麦子、绞花椒、摘果木等活计,几乎全由妇女承担。凡是能爬山的妇女都会到山上采草药卖掉,用来增加家庭收入和挣自己零花钱。

养殖也是主要由妇女承担,且主要为了卖钱补贴家用,不是为了改善生活;家境好点儿的才留一些自己过年节吃。家养主要是猪、鸡、羊。为了保护山林植被,去年开始禁止在山上放山羊,但可以牵着放和圈养。小尾寒羊是最适于圈养的优质羊种,但因售价高,一般农户买不起;起初政府鼓励贷款养这种羊,现在村民反映贷款也不易。成规模地放养羊群是男性的事,因为需到较远的指定的地方放养且风险大,刘凤仙和宋正英告诉我们她们的丈夫都因放群羊而赔了钱。

(3) 女人:离家外出真难

妇女外出打工明显地少于男性,她们面临着许多阻力和困难:未婚的女性去打工,对她们普遍“不放心”,怕她们“学坏”,或上坏人的当,被骗,跟人跑了(王萍);已婚的妇女外出,认为她们不管家,不是好女人。即使能出去,对工作的选择也比男性狭窄得多:家里人说不小到小饭馆那种“不正经”的地方,女孩子到那里不安全;别人说“当保姆太小气,做人家的丫鬟让人家看不起”(刘凤仙);活儿太重,也干不了……事实上,这些障碍都是人为设置的。

刘凤仙从15岁开始(1982年)独自到北京当保姆,经过一些周折,来到陈慕华家,受到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对她的人生转折具有重要意义(刘凤仙)。王萍第一次出门,父亲不同意,自己硬出去,虽没挣到钱,还是平安地回来了(王萍)。如果生活确实需要,妇女不但走出家门,而且还同男人干同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周楠讲述她婚后为还盖房子的欠债,和丈夫一起到外面当建筑工,男人干什么活儿她干什么活儿,打地基的重活儿她也干过。(周楠)阻力主要来自于传统的分工观念和角色定位思想。人们认为,女人的位置在家庭,也只有在家里才是“正常”和“安全”的。像刘凤英那样的家庭和自身很好的条件外出时还困难重重,她说:

1981年我生了闺女后,一日3餐,一封闭就封闭了15年。我想:我有能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呢。我想出去闯闯,做点服装啊,搞点别的生意啊,家里人有封建意识,婆婆不让出去,公公也不让出去,姥爷不让,舅舅也不让出去。我家丈夫更不用说了,思想不解放,总觉得女人出去人大心也大。社会啊各方面都变化了,封建意识还在。我跟我弟媳说:“孩子撂你这儿,该打的打,该骂的骂!”那时国卿在保定给人家做饭。我知道他不愿意,趁他不在家,我就去了。

(刘凤英)

(4)变:分工不是“天生”的

黄龙寺也存在着性别分工格局和观念的例外和据时而变的现象。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做针线活少了,衣服、鞋袜都是买着穿,没有人再把妇女不会做针线当成一种大的缺陷了,而种地包山植树这种以前以男性为主的活儿,也主要由妇女承担了。再比如,即使在以前,贫困的黄龙寺并不像华北平原地区严格坚守着男女的绝对性别劳动分工,像刘凤仙的母亲李淑琴因幼年丧母,没人教她做针线;而她的父亲曾在部队参加“大生产运动”,能给女儿做鞋穿(刘凤仙)。刘凤英的父亲也是在军队里学会纺线、纳鞋底,转退

回乡还保持这种习惯,在家里纳,队里开会,他也边开会边纳鞋底,也没人笑话,自己感觉很正常(刘巧云夫妇);性别分工的习俗不是固定不变的,文明社会的性别分工更多的是文化构造而不是本然必然如此。

(5)传统的力量:家和女人“还得靠男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妇女在劳动中和男人干同样重要的工作(过去男人种地,现在妇女种)和创造同等价值的财富甚至事实上超过男人(如妇女既种地又养殖,有的还外出打工挣钱),甚至在社区妇女已居于决策者的地位,但在妇女和男人的主观认同上还是认为“家”是由男人支撑的,女人说话是没有权威性甚至老娘们儿当家要倒霉。刘凤英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

(包山后)1993、1994年天都旱,得给山上担水,别人说:“丈夫不在家,这女人就成精。包山啊包树啊,听老娘们儿的,这女人当家就是当不了!”他们就是瞧不起妇女。

(刘凤英)

瞧不起妇女的“封建思想”不光男人有,妇女也有。令人不解的像刘俊荣那样能干的女性,也认为自己得靠男人生活。她说:

这地方总体说靠男人生活。女同志也就是料理家务。从我的感觉上女同志还是靠男人生活,女的生活不能自立,身体好的还行。从我亲身经历说就是靠男人生活。

(刘俊荣)

俊荣在村里当过妇女主任,她从自己的体会推论所有的妇女,也难怪寡居的刘玉珍尽管自己种地、养鸡、打柴,她内心和言语中还是流露出对参军的两个儿子和娘家兄弟的依赖。妇女在家庭的实际贡献以及她们对家庭责任感与自我评价偏低形成鲜明的对比。

2. 村社:妇女的社区参与与交往

(1)社区参与的变化——缺席——配角——决策

黄龙寺妇女在社区中的作用和活动范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重要和扩大了。解放前,即使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像刘燕荣那样的女党员,也呆在家里,没参加社会工作(刘燕荣)。解放后,特别是集体化时期,为了对妇女劳力的管理,每个生产队都设有妇女队长,但是妇女队长要受男队长的领导,有时妇女需在男人的监督下劳动,因为她们技术不佳甚至偷懒;评工分完全是男队长的权力,男女日差2分(最高男10分、女8分),男女干的一样多工分也有差别。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在男女平等的时代(刘巧云,葛素梅)。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生产活动成为分散的各家经营,但妇女在社区的活动反比以前活跃了。80年代妇女小组长和妇代会主任介入了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工作,查体、透环儿、打预防针等这些与妇女有关的社会工作与活动日趋频繁,尽管有些工作在最初遭到村民的反感,社区活动分子“抓计划生育工作挺难的,老百姓也骂大街”(刘凤英)。但社区骨干的忍辱负重是有成效的,新一代的黄龙寺妇女很少有超过两个孩子的。1995年,38岁的刘凤英从妇女主任的位置上被推举为村党支部书记,妇女在社区事务参与上,从配角进入决策核心层,这在黄龙寺村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不管处于什么情势(如临村龙居村有女村长)和出于何种考虑(如认为对外公关找钱妇女有“优势”),但最重要的还是本人的条件,高中毕业生在这个村子里实属凤毛麟角,她的干练和有效的工作在任妇女主任时就表现出来,1995年,在第一次参加老促会的培训班时,她就为村里搞到第一笔筹建学校的捐款。此后进入主要领导决策岗位,她和同事们四处奔走,筹款项,引进信息、人员,制订了各种发展规划,“希望工程”、“幸福工程”、“光彩事业”一个个地引入这个山村,使更多的儿童、母亲和其他村民受益。刘凤英的魅力还在于她的道德影响、亲和能力和乐于助人。作为一个女性,她的每种社会性别角色和公共角色都得到比较完美的体现,如社区里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她对姥爷、舅舅的奉养与病中伺候;

她还用学过裁缝的一技之长为乡里做衣服,也肯帮助妇女出主意等,她们愿意说心里话,年轻妇女还很佩服她(王萍)。

(2) 社区互助和人际交往中的活跃角色

村民的社区互助与交往也具有性别的特征,男人多是在盖房修屋上义务互助,小工都不要工钱,有时连饭都不用管,只是你帮我、我帮你;而妇女多是习俗方面的交往,也更显得活跃,像婚丧嫁娶生孩子的礼尚往来,困难时的借贷都是以妇女为主。借钱绝对是妇女的“外交事务”,借钱先找娘家人,再本家、街坊邻居;即使到男方的亲戚家借钱,也常常是妇女出面,大概是男人要“面子”的关系。婚丧嫁娶除了亲属(戚)之外,村民即使没有上述关系也要略有馈赠,如送上几元钱和一些饼干之类的东西,说不清是出于联络感情的需要,还是从众的表现。生孩子有“送汤”的习俗,即在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或第五天邻居给送挂面(第四、六天是禁忌日,害怕得“四六风”)。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自发在生产上的互助与自助组织值得特别关注,像刘书玲等四姐妹的包山小组,完全是自愿行为。还有黄龙寺的妇女骨干一直想办一个由妇女集资、主持和生产的企事业,目前苦于资金短缺而未果。还有妇女中开始学习新的技术帮助妇女解决一些困难,如刘书玲学了新法接生后,义务给社区的产妇接生,取代了婆婆是理所当然的接生婆的传统。更多的妇女间的互助与自助是社区工作的重要任务。

(3) 聊天与街头聚会:营造舆论与“小众传媒”

街头聚会聊天是社区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场所,这个场所几乎相当于村里的信息交流站,也是道德舆论的仲裁处,还是互相学习各种知识技术的露天课堂。大的自然村都有固定的地方,多在一片空地,夏秋之夜,男男女女,或蹲或站,有时共同、有时分头谈论有关的话题。我们在黄龙寺的访谈,每到一处,如果是在街头采访,马上就会围拢来一群妇女,往往由单独访谈变成集体讨论。黄龙寺妇女的合群热情和直言无忌正是她们习惯于人际交流、心态

开放的表现。这种街头聚会营造的舆论有时通过议论而笑话不合社区“习俗”行动的人,也有时从自己的角度对一些社区特出人物说些“闲言碎语”。齐桂贤就对议论笑话别人丧葬从简、不摆摊的舆论导致大操大办的风气盛行非常不满,希望政府像抓计划生育那样狠抓(齐桂贤)。刘凤英自有另一番苦衷:

村里也有风言风语的,一出去就是老书记和我,一男一女。有人说:女人出去,她不是仗着是个女人她才办事呀!我想,脚正不怕鞋歪,说什么我也不在乎!有时,对人们的闲言碎语,也着急上火,1995年急得我牙疼嗓子疼。

(刘凤英)

3. 婚姻:摆脱无奈,向往自主与幸福

(1) 往昔的无奈:纷繁的婚姻形态背后

在黄龙寺,男婚女嫁的男本位的从夫居婚姻并没有大的变化,从80岁到20岁的妇女,嫁到夫家是普遍的。但是,在平原地区少见的招赘(包括过继女子再招赘)的婚居形态,换亲、拐卖等多种婚姻过程在这里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甚至在一个家庭中,多种婚姻形式并存。像李淑琴的一家,她本人是离婚改嫁,与第二个丈夫又生育4子1女,因为贫困,第四个儿子从小送给本村龙塘的一家,第三个儿子招赘到满城,先用女儿为二儿子换亲,然后为大儿子前后从人贩子那里买过两次媳妇(第一个跑了)。

招赘在华北平原地区是受歧视的,“小子无能,改姓换名。”“上门女婿”不能自主不说,最不能忍受的是生下孩子要姓女家的姓氏。在黄龙寺这样的山村,招赘也有一定的舆论压力。招赘对男方来说,一般是降格以求,如弟兄多、贫困、娶不起媳妇,就给无儿子的有女户做“上门女婿”。像凤仙的三哥和素萍的大哥都招赘到山下,凤仙妈很庆幸女方也姓刘,孙子不用改姓;而素萍大哥的孩子改姓女家的姓了——这是男家的无奈。但有时也是女方不得已

的选择:刘凤英的婚姻就是为了心疼父母、孝敬长辈,因代替有病的哥哥过继给舅父和姥爷(不是亲姥爷)在前,故以自己优越的条件降格以求招赘在后。幸运的是他们的文化程度相近,相濡以沫共同奋斗的生活营造了他们的令人羡慕的家庭。换亲主要是因为贫穷而又要传宗接代,作为家长首先就是牺牲女儿的利益为儿子换回媳妇,生儿育女,不致断子绝孙。刘凤仙的长达近3万字的自述抱怨命运的不公平就是起于换亲(刘凤仙)。独自经营承包山林果的刘翠英也是换亲。但她自言是出于孝顺母亲(刘翠英)。买卖婚姻在这里也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当地外嫁的姑娘大大多于招赘到外面的小伙子,山里的小伙子娶妻难,只好从不法的人贩子那里以低于当地婚姻市场价格的钱买媳妇(如娶一个媳妇需一万元的话,买媳妇最多四五千元)。在我们的访谈中,有两位是被同一个人贩子拐卖来的年轻媳妇(倪丽,宋正英)。

黄龙寺主要是村内通婚,10多个自然村的300多户中,姓氏非常集中:刘姓占了80%以上,其次有葛、李、方、焦、于等姓氏。同为刘姓也不一定是同一族源,如有从山西来的刘已在黄龙寺延续了10代,还有易县刘(如刘凤英父亲的家族)。改革开放以前,除了少数由亲友介绍的跨村、县的婚姻外(包括外娶和外嫁),绝大多数是村内通婚,同姓婚姻是普遍的,这里面又不排斥近血缘关系,当地人认为,“姨儿亲”(外甥女嫁给姨母的儿子)比“姑舅亲”更符合优生的原理(臧翠芝)。本村通婚大抵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在普遍贫困的前提下,地势的“上下”方位便构成了通婚等级的最重要标准:上面的姑娘愿意“下”嫁,而上面的小伙子就不易找到媳妇了。于是招赘就是一条出路,像凤仙的三哥就到满城做了上门女婿(李淑琴)。另一种就是与居住在下面的贫困户换亲。即使如此,也总有一批娶不到媳妇的“光棍儿”。到了80年代中期,人口流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买卖婚姻的恶俗与犯罪分子的拐卖人口的不法行为结合起来,就为山里男青年找媳妇开了一条“黑道”:人贩

子利用一些女青年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又急切地想找到工作挣钱的心理,以找工作和许以好生活为诱饵,骗拐妇女到农村或山区,把她们按年龄、相貌论价,卖给那些过去贫穷最近外出打工挣了一些钱而一直盼望娶妻生子的山村男青年。宋正英和倪丽回忆起往事,至今还抹不去心中的阴影:

我是从贵州来的,是骗子给骗来的。刚来时,家里不知道……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只想到外面去干活儿……他们还是说领我们去打工。两天后他们还没有来,才知道是把我们卖了。

(宋正英)

家庭(族)是一个整体,整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有义务为这个整体的生存、发达、延续效力,家道兴、个人兴,反之亦然。所以就有了不但父亲逼女儿为儿子换亲,也有母亲为儿子娶不上媳妇着急,女儿心疼母亲而给哥哥换亲,还有女儿要求代有病的哥哥给后姥爷过继从而降格招赘;既有父母张罗为儿子买媳妇,看媳妇唯恐买来的媳妇跑掉;也有姐姐为弟弟、嫂子为小叔子买媳妇等现象……(东沟)凤仙的父亲对女儿说:

如果咱家娶不上一个媳妇儿,咱家岂不断了根苗?要是换上一个人来,总算是一家人家了。我这做父亲的,就是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再说,换亲又不是咱家实行的,自古到今多少年来就是实行这一方法!

……认了命?谁让我是个女人呢?把心一横,为了孝敬父母,为了哥哥的幸福,就是死了,也要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

(刘凤仙)

(换亲)不愿意也没法呀!当哥的没媳妇儿,当妈的也不好过。那会儿穷啊,再往后退5年,说什么也不换!花钱买呗!就是心疼自己的妈!

(刘翠英)

我要不是上我姥爷家去,和刘国卿绝对成不了。当时我的选

择是搞出点儿事业，可家庭条件所迫，非要我找个上门的女婿赡养老人。

(刘凤英)

妇女面对贫困和强大的家庭传统，在婚姻方面更多的是无奈的选择。

(2) 年轻一代：向往自主与幸福婚姻

向往自由幸福美满的婚姻是每个妇女的梦想，刘凤仙起初坚决反对给哥哥换亲，内心斗争非常激烈：

如果不换，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换吧，可我一生不会得到幸福。心中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对着老天爷哭诉：天哪！为什么我哥哥娶不上媳妇儿，这笔债叫妹妹偿还？这哪儿还有“自由”二字？

(刘凤仙)

在新婚之夜，她还向丈夫宣传她的“爱情观”：

我问他：“你知道爱情标志着什么？”他说：“什么是爱情，我不懂，咱庄户人家就知道生儿育女，哪管什么爱情和感情？”我气得要命：“你这个蠢货，真是傻瓜，亏你说出口！一对夫妻没感情怎能建立起美好的家庭？应该互相理解，互敬互爱，互谅互让，才能达到爱情的标准。”

(刘凤仙)

黄龙寺几代妇女为婚姻的幸福进行探索，自主婚姻当然是一种理想，但不一定是幸福的保障。80年代中期兴起的人口流动和打工潮，也给黄龙寺村的婚姻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因异地打工相识自由恋爱结合的婚姻越来越多了。30岁以下的年轻媳妇，不少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河北、北京……她们多数是外出打工与丈夫相识，结婚，生了孩子，丈夫仍在外打工，她们就成了黄龙寺的“留守媳妇”。这样的媳妇在黄龙寺大约能占到10%左右。多数女青年来自平原生活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和比较宽裕的家庭，只

因看中了小伙子才愿意嫁给他的。从外县嫁来的安兰杰说：

我和爱人是在保定肠衣厂干活认识的。有了孩子后就回家了。我们是自己搞的，自由恋爱的，就不嫌家里是山区了，同心了就不嫌了！

（东沟）

青年人要求自由恋爱，推动着老一代的前进，“父母也都想开了”，“自己搞的，愿意，（父母）就不管。”但她们的代价是不得不忍痛割爱，在结婚生孩子后舍弃原来的有酬工作，回到丈夫的家里，她们中不少人还想在孩子大些后再继续外出工作（东沟）。自由恋爱也不能保证把感情牢牢地锁进保险箱，有的女青年婚后回到丈夫的家，度日维艰，后悔不迭；但她们又面临有孩子后离婚的难题：离吧，有孩子的妇女离婚在社区是遭到强烈的谴责的（村里有一个妇女在黄龙寺通汽车后与外村一个司机“跑”了，撂下孩子、丈夫与婆婆，成了村民议论中的坏女人典型）；不离，度日维艰。自由婚姻的离异还有一层障碍就是自己找的，怨不得别人，怕人说自作自受，所以有的主张“自己搞的，后悔了，也不要说出来，要自己忍着”（东沟）。顺便提一句，在离婚的问题上，山区似乎比平原更少见，山区家庭的“超稳定”，是因贫困蔽塞婚嫁不易；婚姻，仅仅停留在解决生育、性欲的家庭生产和再生产的最低水平线上，精神情感的需求较少。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开始注重感情和婚姻质量，为“情”而合，无“情”而散，散了，再找个对心思的，也是情理中事。我们了解到的多数自由结合的年轻夫妇，感情比较和谐融洽。

4. 家庭：权力、情感、道德的交汇

（1）谁当家

老一辈（70岁左右）是从旧社会和大男子主义的夫权影响过来的，丈夫在家相对妻子而言更具有权威性。李淑琴告诉我们她家有事丈夫说了算。事实上从儿女的婚事如凤仙给二哥换亲的过

程来看,父亲一直是主谋和决策的角色。

他在的时候,他当家,我不当家。我是离了婚过来的。他不嫌我是离过婚的。和老伴没吵过架。他当家,我也当家,商量着来吧。有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老娘们儿能做什么主?没有什么大事,有事就商量着办呗,有事都给我商量。

(李淑琴)

刘燕荣夫妇是村里资格最老的党员,40年代他们结婚后,对家事所有决定几乎都是以丈夫为主:如结婚时搬到山上住,生孩子后又搬下来,为了保胎要别人的孩子“冲一冲”,以及后来接连不断地生10个孩子……妻子都是无奈地服从(刘燕荣)。有的主干家庭在权力关系方面较为复杂些,刘巧云和刘永春老人也许是这类家庭权力关系的“理想典范”:

春:我主事,我是当家的。不过,我们家关系不错。小荣是我们儿媳妇儿,和她婆婆没有红过脸,没有抬过杠、吵过嘴……在钱的上头,小子挣了钱也给我,给她零花钱给多少我也不管,当老公公的也不过问。不过,大部分钱都交我,给她点零花钱。

云:家里该买什么就买什么呗,你说该买什么啦,买就买呗,商量着办吧。钱也不在他手里。钥匙就在外头,他不在家,你说买什么东西,开门买了什么再放回去。

春:有个锁,钥匙就在外面,谁花谁就花。她妈在家,儿媳妇说买什么,给我拿个钱儿;她妈不在家,个人拿也行。

(刘巧云夫妇)

当家理财,是家里最重要的权力,也是最容易发生矛盾的导火线,分家在农村的普遍,多因经济问题,刘巧云的家庭在“父家长”当家的前提下,对钱的支配权是比较均衡“民主”的。除了理财权,对子女的婚姻决定权原来也多归于父母,像刘凤仙就是父亲坚持叫她给二哥换亲;如果父亲不在,母亲的影响也很大,像刘翠英就是心疼母亲为哥哥换亲的。父亲和母亲在家庭整体中已成了一种

符号和象征——代表了某个家庭(族)整体的利益,所以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家庭的“利益”而宁肯违背儿女甚至自己的本性和意愿去行使权力。制度、风俗的传统加上贫困交互作用加固了父权的力量,而具体的父亲可能是位慈爱的甚至还会给女儿做鞋穿(刘凤仙)。

从50~60年代活跃的一代人开始,在家庭中,妇女的决定权显得越来越大,可能与男女在集体生产时期同工的生产方式有关,也与当时的共同贫困有关,家庭只成为生活互助的场所,夫妻中午从地里回来后,一起忙烧火做饭带孩子,不然不能保证下午准时出工(葛素梅)。改革开放时期活跃的年轻一代,不论何种婚姻形式组成的家庭,夫妻关系在感情交流、注重和谐合作和决策上的民主都改变了许多。不仅仅是因为男人到外面打工,妇女才提高了家庭的权力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和社会进步、时代风尚有关。物质条件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外交往的增多,妇女在家庭决策上有时可以独当一面。刘凤英决定承包和招标的成功都是丈夫不在家自己决定和操作的,刘书玲包山小组4名妇女也是如此:

(书玲:)我早就想承包一片荒山,和丈夫商量了一下,他也没有说什么。后来我们包山的时候,他也不在家。我和刘冬儿提出共同承包;其他两个姐妹想包没包上,我说:“一起干吧!”所以就组织了一个“四姐妹组”……

(玲、冬:)承包的时候,他们都没在家。我们个人做主呗!

(刘书玲及包山组成员)

妻子管钱在黄龙寺成了普遍的理财模式,因为丈夫在外打工,女人在家,挣钱交给妻子是自然的事,41岁的刘艳玲虽然在家里只享有“缺席决策权”,但丈夫在外面挣了钱一定要交她,她说:

他不交家里怎么行?得养着家里……还是老头在家里说了算;当家的在家听他的,不在听我的……大事他决定……

(刘艳玲)

在家庭权力方面,不但有随时代变化的轨迹——妇女越来越拥有家庭决策权,我们也发现个人的因素其中个性和贡献的大小起不小的作用。像齐桂贤那样泼辣能干快人快语的妇女,在家庭绝对是“大拿”,她敢于当众人面指责丈夫的无能,反衬她在家中的重要(齐桂贤)。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再能干的实际在家中更重要些的妇女也要给丈夫留“面子”,不轻易伤害男子汉的自尊心。刘凤英忙村里的公务,对于家务,她似有歉疚的苦衷:

在家中我有三分之一的功劳。自古以来总是男主外,女主内,对我都不一样了,我在外跑的时间挺多的。家中谁说得对就听谁的。

(刘凤英)

(2)情感、伦理和面子

值得特别指出来的,华北农村的男人在情感的表达上比较粗疏甚至有轻情感重伦理的倾向,而相对而言,妇女对情感生活的需求比男子强烈和明确。像刘凤仙在自述中表达的对爱情感情的看法和她的丈夫在这方面的麻木就是例证。越是年轻的女性对夫妻感情生活越看重,这与她们的文化教育程度和传媒的影响密切相关。23岁的刘华说:

我指着电视中俩人好,感情交流,非常感动,有时就对他(按:丈夫)说:这电视里的事就是对你的教育!可他说:那些都不是事实,都是编的,不是事实。他不相信,可我非常羡慕别人那样亲密。

(刘华)

多数男人还固守着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即使年轻的男子,也要不失男人和丈夫的“面子”,感情内倾,不善表达的丈夫,使新一代的妻子们大为失望,甚至潜在着感情危机(刘华,王萍)。不是没有感情,而是不大愿意和善于表达,对妻子的关心照顾特别是养家的责任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感情的价值远没有家庭利益重要。从贵州来的媳妇倪丽和她的丈夫的关系很融洽,互买衣服和赠品

以表达感情；丈夫体贴妻子是南方人买大米给她吃；妻子也做可口的南方菜给丈夫吃；一对儿女也很可爱。但是，他们之间也曾发生过冲突与磨合：当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起回贵州探亲的时候，倪丽的母亲想把一家人留在贵州，倪丽的丈夫不辞而别，把孩子带回来，独撇下了倪丽。至今，妻子谈起这件事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孩子也给他生了，他怕把孩子户口上在安顺，就把孩子偷走了。把孩子偷走为自己养老，妻子不要也没有关系。

（倪丽）

作为北方的男子汉，倪丽丈夫的做法是顺理成章的逻辑，不想在妻子家落户（不单是生活习惯问题，更重要的是上门对男性的“压抑”），妻子若不肯回来，这时保住自己的孩子是最重要的了。男性本位的父子相承的家庭利益一旦与女方（个人或家族）发生冲突，是绝对遵循“利内则福”（有利于男家，语见《国语·晋语》）的原则。父权——夫权制家庭至今难超越其狭隘性。这就是目前一再提倡男到女家落户困难重重的原因。

黄龙寺村和山区许多村庄一样，很少有离婚的现象。贫困的人家娶个媳妇不容易，感情还对多数夫妻来说较为“奢侈”，实在过不下去，想离，还怕人笑话。刘凤英说：

农村离婚的特别少，一般的都有点封建意识，凑合着过也不离婚，有一个半个的，不太多。真是，一离婚，怕人家笑话，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刘凤英）

（3）“孝”和“慈”：责任还是美德

在家庭代际关系上，黄龙寺现在很少有数代共爨的大家庭了，常见的是结婚后就与父母（公婆）、兄弟（妯娌）分开过；如果是独子，也可能与父母同炊，若媳妇和老人都认为分开过自由，也有分家的。家庭中代际的冲突减少了，但养老孝亲的事情提到了议事日程，老人对此尤其关心。尊老孝亲在黄龙寺绝对是一项流传下

来的美德，从刘凤英对舅舅和后姥爷奉养和伺候受到村民的交口称赞中，可知孝长养亲作为美德一直是村民的共识。出力气伺候老人生活是孝行，老人能自理给钱给物也是孝举。分家虽然在黄龙寺十分普遍，但分家也不能说明晚辈的不孝，因为分家是一种趋势——年轻人喜欢自由，老一代图的是个省心；但有的情况问题就复杂起来——刘刁儿的苦衷也许能说明孝的另一种意义：她的丈夫是抱养的（按：李淑琴的四儿子），结婚后老人提出要分家，刘刁儿夫妇3次拒绝；她向我们诉说苦衷：

因为不是亲生的，如果分了家，村里人会笑话我们做儿女的不孝，不愿意养老的。当时我丈夫给他爹下跪，求他们别分家，要不，村里人会笑话我们的。可是他们不听，只好就这样了。

（龙塘）

“孝”好像必须做给别人看，晚辈的孝行也需要舆论肯定。当然这个案例比较特殊——刁儿的丈夫不是亲生儿子，但亲生的也需做给别人看，需要别人给予孝顺的评价。

关于养老的方式，分家后一般是老人的责任田交给儿子家种，儿子给老人一定的粮食、钱、肉、柴等。目前，由于男婚女嫁的从夫居婚姻模式未变，男子又多外出打工，养老的重要承担者实际是儿媳，从代种地到给东西，再到有病时的照顾护理……儿媳的作用是儿子和女儿取代不了的。然而，正是这种权利义务的紧密关系带来的利害冲突使得婆媳之间“冷战”不断，李淑琴谈到与两个儿媳的关系：

我和媳妇关系不怎么样。大儿媳爱骂人，我不能和她一样骂；骂她，她跑了怎么办？看自己儿子份上就受点委屈吧。我与老二媳妇的关系也不行。因为换亲，她也不愿意。我老二和我呕气，说：“我不养你！”我说：“你不养我可行？你要不养我，你给我拿奶钱，拿‘妈妈汤’！”

（李淑琴）

村里,婆媳矛盾是家庭纠葛的“主题”。村里也有个别严重虐待老人的现象。看来,在养老方面,老一辈占有道德的优势,但经济上的主动权却操在儿媳手里;贫困和世俗化往往激化婆(公)媳之间的矛盾。认识父权家庭构造以及它是如何造成妇女家庭角色的流动、分割和利益冲突,有助于理解婆媳矛盾的实质,从而为解决妇女之间的“家庭内战”找出办法。婆媳角色的宿命流转及其冲突,正是小家庭和赖以脱胎的大家庭的利益冲突在妇女身上的体现。历来是用提倡、表彰孝道,克制媳妇的欲望来稳定家庭。在现在妇女多重角色日趋繁重的情况下,应该在发展社会、社区公益事业寻找出路,以解决妇女的内耗和紧张。

家庭是个谈不尽的话题,既有令人烦恼的夫妻纠葛、婆媳呕气,更有温情互助的天伦之乐。家庭目前仍是黄龙寺妇女的主要社会支撑网络系统,尤其和娘家的关系更为密切和重要,这是由黄龙寺社区通婚范围决定的。借贷、看孩子、帮助干活……妇女主要找“娘家人”解决难题。像刘凤英到外面学剪裁,就把孩子交给弟媳看。相处好的婆婆也是重要的帮手,刘翠英在孩子照顾上依靠婆婆和孩子的姑姑,果树的管理则请哥哥、妹夫和丈夫的朋友帮忙;同时,她家包山挣来的钱,也帮助孩子姑姑家盖房子(刘凤英,刘翠英)。如果娘家在外地,就只有求助于婆家了,如周楠在外出打工时,孩子由婆婆刘秀梅看管(周楠)。

对上辈人的孝养,既有出于道德舆论面子的外在因素,又有天性和良知的内在作用;而对下一代的苦心孤诣,全力培养,则是完全自觉的。村里年轻一代的家长(45岁以下),无不把培养孩子上学、成才当作家庭首要发展目标,不论家长多么刻苦自己也要叫孩子上学,有条件的家庭还把孩子送到满城的私立学校。许多妇女对孩子的最大期望是让他们考出去,离开山区,不叫他们再吃自己这样的苦。只有少数人表示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回家当新型农民(刘书玲)。从做母亲的对孩子的期望中可以感受出一种矫枉和补

偿心理:自己没有实现的梦让孩子去圆梦。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直接影响到生育率,有一个女孩不要二胎的年轻妇女越来越多。周楠说:“还让再生一个,我不愿意要,嫌麻烦,不好养。将来小孩子上学,不能跟咱们似的好歹上上。”在对子女培养方面,看不出有性别偏好,都抱着男孩女孩一样培养,谁能考上就供谁的态度,只有女儿的人家更希望姑娘能争气。

5. 妇女与生育健康

(1) 生育率与婴儿死亡:节节下降

从对不同年龄妇女的访谈中,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随着年龄的降低,妇女的生育和健康状况逐渐改善。从生育的胎次、婴儿的死亡数、性别偏好以及产前检查、接生的条件和技术、产后的营养与保健等都显示了这种变化。

70 岁以上的妇女生育胎次一般在 10 个左右(臧翠芝,刘燕荣等),51~69 岁的生育数量为 3~5 胎,41~50 岁为 2~4 胎,20~40 岁为 1~2 胎。70 岁以上婴儿死亡在半数以上,如刘燕荣生了 11 个,死 8 个;臧翠芝生 10 个,死了 6 个,老人告诉我们:她就怕儿媳、孙媳打孩子,她那时孩子死得多,死怕了。刘燕荣伤心地回忆她一个个刚出生就死掉的孩子……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婴儿死亡率也大大减少。计划生育实行以来,出生率再度降低,婴儿的成活率几乎达到 100%。计划生育在黄龙寺目前已不成为难题,很多年轻的妇女只想生一个孩子,不管男孩还是女孩;生了一个女儿的也不再要了(周楠,王萍)。

(2) 接生、营养和保健:逐步改善

在改革开放以前,黄龙寺一直是以土法接生为主,多是在家里生孩子,接生者依次为:婆婆、街坊、自己、丈夫、其他人。生孩子是不能回娘家生的,即使都在一个村也不行,所以婆婆成了首选的接生婆。街坊,是找专事此事的接生婆,一般是遇到难产或婆婆不擅

此道的情况才找。自己接生,是因婆家人都不在,突如其来的生产,李淑琴说她5个孩子都是自己接的生。奇特的风俗是丈夫不回避生产并接生助产,刘巧云夫妇说生女儿凤英时就是丈夫接生的;这位抗日老八路军会纳鞋底、纺线,还会接生,而且懂得许多产后护理的知识。其他人有时是本家,大娘、婶婆婆之类。旧法接生剪脐带的剪子不消毒,包扎用一个布条随便绑起来,所以婴儿患“四六风”的特别多,以致在“送汤”的习俗上也避开第四、六天这两个“不吉”的日子。

现在,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都在妇女的生育健康方面给予关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妇女对自己的生育条件也有了较以前高的要求。老一代妇女总爱说现在的妇女“娇气”,动不动就上医院,“我们那时如何如何”……恰恰反映出时代的进步。育龄妇女除了两个月1次的例行透环儿检查之外,孕妇还有的到医院或请村里的医生做产前检查,受过专门训练的村医还给孕妇讲孕期和接生知识,也有妇女自愿学习接生技术,然后给本村妇女接生,刘书玲已为龙塘妇女接了7~8个孩子(刘占栓,刘书玲和葛小妍)。现在虽然还是以在家生孩子由婆婆、邻居和村接生员接生为主,但由于通了汽车,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送到医院生。村医刘占栓告诉我们:“一看不行,马上租个小车,拉到县医院!”关于产后保健和营养,50岁以上的妇女在月子里从喝糊糊到吃鸡蛋、面条情况不等;有丈夫、婆婆伺候月子的,也有没人伺候的,有的第二天就自己做饭(刘燕荣)。现在一般家境的营养状况也大有改善,条件好的产妇不但吃得好,月子里还得到较好的照顾。就从吃鸡蛋数量来看,妇女的口述反映出时代的变化,生了10多个孩子的70多岁老党员刘燕荣说:

生头一个孩子,一个鸡蛋也没有吃上,喝了二两糖;第二个月子,那时养了鸡,吃了10~20个;第三个,老头子就不愿意啦!(按:前3个孩子都死了,怨妻子保不住孩子。)

(刘燕荣)

62岁家境不错的葛素梅叙述她和儿媳生孩子吃鸡蛋数量的对比：

我那时坐月子……生第一个孩子月子里吃了五六十个鸡蛋，生老丫头时吃了100个。我大儿媳儿媳生大孙子时，那时正月十三，吃了二三百个鸡蛋；满城的媳妇儿前些日子坐月子，吃了1000个鸡蛋。

(葛素梅)

计划生育被山区农民逐步接受，直接导致出生率的下降，黄龙寺现在每年才生十来个孩子，年轻妇女不必像老一代那样频繁地怀孕和生育，在加上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妇女健康水平不断提高。黄龙寺在60年代中期以前，村里没有医生，有重病需到15公里以外的刘家台请医生，人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忍着或采点草药熬了吃；从“文革”时期有赤脚医生起，现在村民仍把自开诊所的2名医生(男)冠以“赤脚”。刘占栓还兼兽医与村干部。他参与儿童基金会妇幼保健项目，负责接种防疫；曾跟一名下乡的医生学接生，由于医道不错，常被请去处理难产时的接生，他还经常向妇女讲保健、三期检查和接生的知识。村里也曾选派妇女接受接生方面的培训，刘说因为外嫁和“胆子小”，所以至今没有正式的女妇幼保健人员(刘占栓)。像刘书玲那样“自学成才”、义务服务的女性妇幼保健人员，亟待从妇女中发掘和培养。

尽管医疗保健水平在进步，但由于艰苦的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还由于长期以来农民认为能吃能干活就是没病，健康意识十分淡薄，妇女的健康状况也颇堪忧，妇女病比较普遍，像输卵管发炎、宫颈糜烂、宫颈炎最为常见，其他的由于劳累导致的腰腿疼、关节炎、高血压也较多。在治疗上，似乎有一个误区：以往在赤脚医生的时代，重视草药的就地取材，黄龙寺的山有丰富的药材资源，成年男女不少人都有采药的经历，妇女同样具有丰富的草药知识；

但是眼下,人们对治病也患有急功近利的“流行病”,丢弃了省钱有效的草药,而只吃“洋药”,认为见效快,而珍贵丰富的中药材被外来的商贩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当地人还得将自己有限的收入去买价格很贵的西药。

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表格概括访谈的 32 名妇女的状况作为这一部分的小结:

黄龙寺 32 名妇女教育婚姻生育状况统计一览表

年 龄	人 数	教育状况				婚姻状况					通婚范围		生育状况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文 盲	换 亲	招 赘	拐 卖	自 找	介 绍	本 村	外 村 (县)	胎 数	死 亡 数
71~80	2				2					2	1	1	10~11	4~8
51~70	5				5					5	5		3~5	
41~50	4	1		1	2	1				3	2	2	2~4	
20~40	21	1	6	10	4	1	1	2	4	13	12	9	1~2	
合 计	32	2	6	11	13	2	1	2	4	23	20	12		

四、她们的心声和需求

黄龙寺妇女具有中国北方妇女的特质:勤俭质朴、坚忍顽强、拼搏向上。她们是山的女儿,她们有太行山的性格和气韵。这是北方特定的地理、人文、历史环境造就了的。干旱、风沙、战乱,造就了她们的坚忍的意志,儒学的颜李学派(河北儒学)造就勤俭质朴、务实致用的人格气质,革命的传统和改革的希望激发了太行山女儿拼搏向上的精神。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共同塑造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不过,因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因不同状况和境遇,妇女的心声和需求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处。就当前而言,共同的心声是脱

贫致富奔小康,摆脱愚昧,成为文明富庶之乡。为了这个目标,年轻一代,中年的中坚分子,老一代,几多欢乐和忧愁,几多希望和焦灼……

1. 老年妇女:几多满足几多忧愁

老年妇女最大的满足是儿孙满堂,孩子有出息,家道兴旺;最忧虑的是自己的健康和养老:

我老小子上学的时候,当时就选一个,正好选上我儿子,花钱,累点,也痛快!这事,我多活10年。今年,老儿子又添了一个孙子,又多活10年。等我大小子还完债,再盖上房,又多活10年。怎么也得让我孙子孙女上学,又多活10年……担心岁数大了,有病;担心大儿子盖房子;担心孙子考不上学……我就为孩子们担心。

(葛素梅)

这是家境不错、心满意足的老一代的感受,处境困难些的上年纪的妇女是另一种心境:

现在担忧我个人。我和媳妇关系不怎么。大儿媳妇爱骂人。老二媳妇骂,我也不理她,反正她们得养我。

(李淑琴)

尽管晚年的处理生活有差别,但共同的满足感和对山区的热爱之情都溢于言表:

变化可大啦!主要的变化在交通方便了。过去没有电,吃粮食都是人推碾子,也没有牲口。看看这会儿,想想那会儿,生活好多了。

我喜欢这山村,到哪儿去比如到满城了,就想这儿的山村,这儿的人,这块地方。这地方好。我觉得家庭生活也方便。

(李淑琴)

我不在满城住,我受不了,空气不好。在村里痛快!我喜欢真

山真水。我就是喜欢山，我哪儿也不去！现在的生活就不赖，我也不想好生活，这就不赖！

（葛素梅）

2. 中年：事业和家庭的中坚

老人有老人的感受和心声，让我们听听黄龙寺那些中年和中坚妇女的声音，社区带头人刘凤英如是说：

我想：人生一世不能白活，总得有点儿追求，是吧？我就想：不管怎么样，也得把家乡改变。就是说，率先垂范吧，搞个示范。

我想：我富了以后，把所有的贫困户都带动富裕起来，一个也不能叫他们掉队！一个穷得破败不堪，一个富得腰缠万贯，谁也觉得不忍心！带点儿头，给村里办点儿好事，都带起来，都富裕起来！

（带头致富）这是咱的职责，咱是一村之长！我是土生土长在黄龙寺；假如我生长在富贵人家，我也想不到这样。现在我总觉得时间特别紧，不够用。恨不得今天打井，明天出水，特急，总想一下子富起来！早一点儿富起来，早一天省心。咱作为一名党员也还总是有点党性。咱们女人吧，也有自尊心；一个事，说完成就得完成，完不成就比别人矮半截子。女人有没有能力，不是说出来的，得用事实说话。

（刘凤英）

刘凤英的多重身份和角色以及她对自己责任、使命、处境都有自觉的意识，作为黄龙寺土生土长的村民，她立志改变山村面貌；作为社区领导人，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与村民共同富裕；作为党员，她认为完成了共同富裕的使命就是党性的表现；作为女人，她希望自己和村里的妇女摆脱因袭的依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村民、女人、党员、领导多重身份的交织就发出了她独特的声音！

在黄龙寺，还有一大批实干躬行用汗水来改变贫困、创造新生

活的妇女。刘书铃和她的包山小组成员是这样表达她们的心声：

想离开，但没有机会。生在山里，长在山里，不好离开；离不开，只想改变这个山！

（刘书铃）

怕苦不行，光呆着，什么都没有。既然包了，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怕，就什么也干不了。现在苦些，将来甜了。

（刘冬儿）

我们想一切办法也要把这片山开出来。我们四姐妹相处得很好，上山从来也不计较，都认为这是自己的事情。我们一边开山，一边开玩笑：“我们现在栽柿子，到摘柿子时我们就上不了山了！”这没关系，为子孙后代造福呗。

（刘书玲）

我们刨一个坑，栽一棵树。

（葛小妍）

刘翠英，这位黄龙寺承包山林果树最早的妇女，性格深沉，多年独自在深山居住劳作，身边只有一只狗相伴；她行敏言迟，但说起话来，句句掷地有声，且离不开她的山和树：

（当初开山栽树）开始就压下去，活就活，不活就拉倒！

光抱孩子不行，活儿也得弄！

干着也不易！这树，你不伺候它，它不伺候你！

（一人在山里住）开始也害怕，搁在那儿也不怕了。我那时养了个狗跟着我做伴。那个狗，我在哪儿它在哪儿；它要是回家一趟，我不回去，它也回来；回来时它走得快，离我十几步就等着我。（现在，狗）没了，病死了。有个狗就当个人似的。在沟里呆了两年多……

（刘翠英）

令人感受到她内心的坚强和深深的孤寂，具有海明威式的震撼。

在这普通的山村，人人在与贫困拼搏，家家渴盼致富。这是个

有梦可做的时代和地方——致富梦、望子成龙梦、家庭幸福梦、健康梦……

3. 年轻一代：焦灼与憧憬

除了中年人的厚重的务实言和行，还可以听到年轻一代的焦灼的心音。生活的压力和竞争的加剧最先让敏感的青年人感受到了，这种压力有来自理想和现实的落差：

这会儿压力比先前大得多。从个人心理来说，谁也不甘心落后，理想达不到！但谁没个设想？谁都有点儿想法。

（刘俊荣）

更有来自现实的横向比较，这是最能刺激人们不平衡心理的强烈的大量信息符号：

相比之下，我到你家，挺像样；我一看我家，狗屁不如！

（刘俊荣）

于是又增加了压力：

想法改变吧，想法改变就得付出；不付出，想叫家改样儿，完全不是那回事，相当累得慌。活得真累，真是累得慌！原先，有饱饭吃就是万事大吉，看这会儿？！

（刘俊荣）

这种差别的缩小又与集体化时代死卖力气挣工分吃饭不一样了，“现在光卖力气，费死力，钱来不了。”（刘俊荣）现在的竞争，重要的是智力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拥有，黄龙寺村民已认识到这点，所以在培养孩子上，既抱有希望，又充满了焦虑；对前途未卜的智力投资还不知回报如何，眼下的经济重负接踵而来：

这会儿这事，孩子也不想落后。如果一个孩子考上了学，这后半辈子就给他掖（给他钱的意思）吧！

（刘俊荣）

20多岁的年轻人除了脱贫致富的焦灼之外，还有一层精神心

灵的矛盾与困惑。在情感与爱情的领域,在自我发展寻找出路和机会上,她们比老一辈甚至比30多岁的一代有更多的追求,从而有她们独特的烦恼。这代人,差不多都受过小学和初中程度的教育,多有过外出打工的经验,见过较多的外部世界;在农村,她们是受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报纸、书籍等影响最大的人群;她们生长的家庭环境也比她们的祖辈、母辈要好……因而,她们的眼界比较开阔,思想活跃敏感,追求的目标要高,自尊心和自我意识较强,她们需要别人的理解与肯定,她们希望有像电视剧中那样浪漫的爱情生活,希望丈夫能理解、体贴;但她们中的一些人欠缺上代人的坚忍刻苦的意志和务实苦干的精神,过分耽于幻想,甚至还很虚荣,在追求新生活的同时,传统思想的旧痕往往成为她们前进的羁绊。这里,让我们摘取几段关于感情与爱情生活的心声:

(我结婚)那时才19岁,也不懂什么两口子要讲感情,就定下来了。要是现在我就不会这么想了。不管花多少钱,感情不和不行;要找个人的感情,个人的痛快!(山里的小伙子)要是感动了我,我也会同意。只要是感情好,两口子和和美美的,只要珍惜感情,我就愿意。

(刘华)

这是一个从黄龙寺嫁到平原地区农村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准备离婚的23岁的女青年关于爱情生活的心声。打算离婚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她特别强调丈夫不能表达感情,她羡慕电视中两人的感情交流,非常感动,她用此教育她的丈夫,丈夫说那些都是编的,不是事实;丈夫不但不“买”她渴望感情的“帐”,反而请来他的朋友,叫妻子端茶送水,她都满足了他大男子的虚荣。她抱怨:

我就是愿意当着外人的面俩人亲亲热热的,哪怕背后俩人再抬杠、吵嘴呢。我这个人就是好面子……关起门来哪怕打我骂我也行,别人也不知道;要是当着别人的面吵架,别人就会笑话。可我们家那人就是不这样想,当着别人的面什么都敢说、敢骂、敢做。

(刘华)

感情不是虚荣和乞求能得到的,农民的夫权思想加上地域和家境的优越,更使这个内向的丈夫鄙视她这个山里女人,她决定与丈夫离婚,但又顾虑重重,举棋不定:想离婚,又怕别人说自己作风不好,担心不好嫁人;不离吧,再回婆家,又怕村里人笑话……

……常想:结过婚了,不是大闺女了,就不好嫁人了。后来我姐姐说,离婚又不是丢人的事,也就想通了。他们村里也有离婚的,但情况与我不一样,女的不正当,作风不正。这次打架想离婚,要是离不了,好像回去也过不去似的,让人家笑话,会说:挨打受气的,说离婚也不离。怕人家说我没心眼儿。

回来家(按:娘家)后,开始想:要是离了婚,村里人笑话吗?人家一定会说,准是作风不好吧?后来一想,想那么多干什么?谁也替不了我,谁也不知道我的难处,就想开了。下定决心吧!

(刘华)

她又耽于离婚后的幻想,一定要比山村的姑娘们过得好,叫人羡慕她:

我想我以后也许比她们过得还强,自己要强,比她们要强。自己占的地方好,找个男的也挺好,生活过得也挺好;让人家说,离婚也不白离,人家也许还会羡慕我。

(刘华)

这就很让人怀疑,年轻人追求的感情、爱情有多少现代的成分,几乎处处都在考虑别人的评价、态度,避免别人笑话和叫别人羡慕一样都是失去了自我;何况所畏所羡的标准没有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作风不好,失去处女贞操,找个好男人……在这个认识框架下,当年轻的女性难免又陷入历史的轮回!

从黄龙寺妇女对生存状况和心声表达的叙述中,可以感受体悟她们多方面的需求:

物质资源方面——钱、物、树苗……于是脱贫致富是大的需求。在黄龙寺无论访问谁,他们全告诉你他们最大的心愿最急迫的事情就是摆脱贫困,想挣到钱——他们实在是穷怕了,他们也实在太珍惜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时机,人人有许多大大小小、大家小家的 plans——大到村里改造小流域、建立肉牛场、建设旅游区……小到家庭买养种兔、小猪崽、小尾寒羊……包山、种树、修蓄水池、买树苗……妇女们朝思暮想还想办一个缝纫或编织的厂子,以满足不能外出的妇女的挣钱梦,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投入;以往输血式的救济、有项目就拨款的做法早已废置;新的适合于妇女的养殖种植的启动资金从何而来? 如何操作使妇女有较少的投入而有较多的回报? 这都是值得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发展机构的工作人员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从我们从事妇女研究和妇女教育的人员的视角和我们能够力所能及所做的角度来看山区农村妇女的需求是另外一个重心:那就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妇女内部潜在的巨大的能量——包括被以往社会男人甚至妇女常常忽视了的潜能与贡献,摆脱旧的社会性别模式和角色定型,给妇女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树立女性的自强和自信,获得正确的关于社会和性别知识,取得适应社会和自身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要使妇女自己变得更坚强、更强大,“赋权于妇女”(empowerment of women)要从文化素质的提高做起。山区妇女自己不但有权利能力这样做,而且也已憎爱分明了这方面的强烈需求;只要外界提供一定的条件,当地的妇女“草根”的“自我赋权”的发展活动是会取得效果。我们在访谈过程中,亲身体验到妇女的聪明才智,她们的知识经验之丰富远出于我们的想像之外。像 70 多岁的历经苦难的李淑琴,不但认识许多草药,还爬山越岭采草药,她的生活智慧和乐观心态感人至深,她说:

有老话:“老鸡不给送,夜雀不给叨;自己不动手,东西来不了。”还有“小富靠做,大富靠天”。我没有烧过香,没有磕过头。我

不信那些。老鸦不给送，夜雀不给叨；自己不动手，东西来不了。凡事要靠自己。

(李淑琴)

像李淑琴这样的老一代善良、勤劳、朴实和智慧的妇女在黄龙寺不乏其人；至于新一代妇女更对自己的状况和需要有更清楚的认识，如刘凤英意识到“封建思想”对自己外出发展形成的阻力，封建意识对离婚的偏见都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旧思想是通过身边的人，甚至亲人的“反对”和“闲言碎语”表现出来的。她认为除了女性应用自强对付外界的歧视和家庭的阻力外，还应该创造更多的条件使妇女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她说：

给妇女讲讲作为一个女性不容易，应该自信，不能自卑，得有点想法和追求。最主要的是告诉妇女，女人比男人强，不能指望躺在男人的怀抱里享清福。首先认准了的事要一竿子插到底，你要退就会有人歧视，别指望花男人的钱，得自己闯闯，在家里只当贤妻良母不行，得想方设法抓点经济，抓点经济才有地位。

怎样教育孩子，咱农村也不太懂，有时打，有时骂，一啼哭就赶出去了，这也不是个方法。

首先把精神文明搞好，思想一致了，事业就能上。我想买个高音喇叭，到时放放广播，把妇女组织起来。再安装有线电视，使人们接受点儿外部信息，换换脑筋。

(刘凤英)

山村妇女的学习需求也是强烈的，她们这样说：

养羊、养兔方面的技术也需要；喜欢听如何教育孩子、处理家庭生活方面的知识；也爱听关于妇女生理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就是想致富，但富不起来……

(东沟)

我们应该倾听她们的心声，了解她们的生活，理解她们的经验，向她们学习，为她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呼吁更多的组

织和人群行动起来,为满足妇女的发展需求尽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1998年3月初稿

1998年5月修改

1998年8月定稿

都富裕起来,这是咱的责任

被访人:刘凤英(英),女,40岁,高中毕业,过继给续姥爷家后招赘奉养姥爷和舅舅,生有一子一女,都在满城上学,刘凤英现在是黄龙寺主要领导人。

时间:1997年5月1日、2日,8月3日先后访谈3次。

访谈人:方炼,李家福,张喜阳,吴玫,杜芳琴(问)。

录音整理:李家福,杜芳琴,尚绪芝。

一、黄龙寺

5月1日,在我们住宿的地方,我们和刘凤英交谈。

问:黄龙寺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英:原先叫“皇龙寺”,“皇”是玉皇大帝的“皇”,“龙”是龙凤的“龙”,“寺”是“寺庙”的“寺”。

问:有寺庙吗?

英:有,不是大寺,是小寺,有3个小寺。

问:什么时候盖的寺庙?

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问:现在还有寺庙吗?

英:现在玉皇坨上有一个庙。皇龙寺大概与玉皇坨有关。

“皇”也就是玉皇坨的“皇”，后来写成了“黄”了；玉皇坨下面有一个龙潭，是个大坑，出了水啦，叫“龙潭”，这是“龙”字的来历；“寺”，上面有3个小寺，没有大寺；下面文字（音）沟有1个寺，这边山有1个寺，东沟那有1个寺，一共3个寺，可咱们谁也没见过，只是听一些老人说的，没有记载，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问：玉皇坨上的庙是什么时候修的？

英：不知道，在大坨子上有刻的字，现在还有，看不太清；特高，摸不着。不知刻字的人是怎么刻上的，也许那时的人长得高？反正我踮着脚也看着不着。我家有一本关于玉皇坨的书，是县宣传部长刘光雨写的，写得简单又明白。

问：黄龙寺一直属满城县吗？

英：我们村原来属易县——易州，1976年划归满城。

问：玉皇坨能上得去吧？

英：能上去，但不好走。3年前，玉皇坨失了一场大火，一个村民抽烟把烟卷往屁股后头一丢，失了一把火，好多松树都烧死了；还有的没烧死，又活过来了。这几年我们又治理，又点播去了。我感觉，黄龙寺肯定有宝，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现；我心眼儿里有这种预感：黄龙寺有宝，那宝在哪儿啦？只是没有发现。从黄龙寺这个名称的来历来看，肯定是块风水宝地。我们黄龙寺方圆18方公里（即平方公里），人说我们黄龙寺的人都在窝窝叉叉里藏着啦！我们这都是面上的，老书记（男，黄龙寺党支部书记）住在下面那个村（龙塘村），也是面上，往东还有一个村，都在沟里面，表面看不见。

问：都是黄龙寺一个村？

英：嗯，都是一个村。我们黄龙寺有8个自然村组成：东沟，八亩台，西沟口，北湾，龙塘……

问：黄龙寺以外满城县就没有村了？

英：过去就是易县，北面是易县，西面是顺平。

问：山里面比这里更穷吧？

英:也就是这样。不过,我想,我们这儿变化比他们大,原因是我们这交通比他们方便。

问:通车之前人们主要靠走路?

英:是呀。人们走路像上炕下炕一样,谁也不当回事,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那时上学去岭西,走40里路,一点儿也不觉累,特轻松!

问:现在学生上学怎么去?

英:骑车子。早晨起来,吃了就走。咱们这儿离县城90里,现在没人走了;过去人们上学都是走着去的。

问:你们这儿当时没有马车和牛车?

英:没有,当时有个小毛驴算是高级的,我还骑过毛驴呢。

问:咱们村什么时候来的电?

英:1982年来的电吧。

问:什么时候修的路?

英:1977年,1978年吧。

问:是乡里修的,还是县里修的?

英:村里出工呗,县交通局出钱。修路我还修去啦,去刘家台,在那儿住着。那时我刚高中毕业,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

问:是修这边的路(指从黄龙寺到乡里的路),还是那边的路(指乡到县城的路)?

英:一转弯的地方,不到油漆路(即柏油路),下油漆路这段石子路是我们修的。

问:油漆路一时半回儿还修不到咱们这儿?

英:县交通局去年年底来,给我们造了预算470万;预算早已出来,县交通局经费也很紧张。(插话:这路也还可以,就是颠点呗)。

英:这段路我们每年都修一次,有时还修两次,一看下了雨啦,把路冲坏了,就修。

问:咱这里的山是石头的,有没有滑坡的现象?

英：今年咱们也打了坝，怕下雨出事。

问：咱这儿的地是怎么分的？

英：过去由生产小队调配。我们原来十几个生产小队，现在叫村民小组，组建时接原来的生产小队，以生产小队为基础。

问：生产小组是干什么的？

英：原来有大队，现在是行政村。生产小组也不是生产单位，生产归各户；生产小组也不是行政单位。咱们这儿土地5年就变一回，重分，有姑娘嫁出去啦，有老人去世啦。他地多，可有的小孩没地。5年变一回。以生产小组为主，各生产大队管各生产大队。

问：只要有一个孩子就有一份地？

英：嗯。

问：男孩女孩都一样吗？

英：一样。

问：姑娘嫁出去呢？

英：到5年再变。

问：媳妇娶来了也给地吗？

英：到5年，变地时给。

问：如果有离婚的，地怎么分法？住房呢？

英：经过法院判决，由村里安排。离婚的地带不走，农村离婚的特别少，一般的都有点封建意识，凑合着过也不离婚，有一个半的，不太多。真是，一离婚，怕人家笑话，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问：有早婚的吗？

英：现在没有早婚的啦，差一天也不行。

二、包山

5月2日上午，我们和刘凤英一起去看她承包的山。山上的树已有半人高。她的丈夫正在山上忙着为果树浇水。我们一边爬山，一边听凤英介绍。层层叠叠垒起的石埧将山一道道缠绕起来，

挡住了水土的流失；一棵棵果树将 20 亩荒山点染成翠绿。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看到新修的蓄水池，就在池子的水泥沿坐下来谈话。

英：修这个蓄水池的时候，一袋水泥背到上面 3 元钱，开始人们一天背 4~5 袋，背两天就不行了。水泥拉到山下，车上不来。修埝垒石头都是雇人干的，一天每人的报酬是 18 元，还管一顿饭。创业，真是酸甜苦辣……

问：那你是怎样想到承包荒山的？

英：我在儿子 3 岁的时候，种地一出去 10 多里，有一片谷子，是我们的地坝！顶多有 2 分地。上午去，中午不回来，从家里带点儿干粮。晌午，晒得小脸红红的；我的脸一晒就像红布一样，累得我！坐在那就发呆。下午几点钟才回来。我就想：出去七八里，就为种这么点儿地，也没有什么效果。种，是第一次；种上谷子，还得耨，至少耨 3 次，这就又得去 3 次；割谷子还得去 1 次。算来算去是第 6 次啦；收获又特别少，寥寥无几，谷子不是高产作物。我就想：这人一生一世就这样下去，吃不上，穿不上，这怎么说？我想：自己有文化，高中毕业生，当时也算了不起啦！那时，全大队还没有几个高中生啦！

问：现在有几个？

英：现在有三四个吧。我想：人生一世不能白活，总得有点追求，是吧？我就想：不管怎么样，也得把家乡改变。就是说，率先垂范吧，搞个示范。那时我还是妇联主任，有机会出去开会。

问：是哪年啊？

英：我 23 岁那年。那时，我就是妇联主任啦。我从 1982 年就担任妇联主任了。那时我还没有结婚，我好看书，爱搞个革新什么的。我从书上看到种杂交玉米能高产，就搞起试验，就往水浇地里点杂交玉米。当时谁都不相信，说：“杂交玉米，什么杂交玉米？还

是按咱们原来的章程种吧。”春天点上，次年收，生长期特别长。谁也认识不到杂交玉米的好处。我就身先士卒，我就先冒险吧！我从县城买点玉米种子，一亩地点了 3500 棵，挺稠。当时我父亲就说：“哎呀！凤英啊，你是否不想过了？你点的玉米，这么近就一棵，哪有这样的？”有的人说我：“哎！我看见一个人，点玉米不间苗！”是说我点的太稠呗！一亩 3500 棵！我看书学的！我爱学，爱看书。我爸爸说：“是不是我把苗间去？”我爸爸就这样，总说别人如何如何；别人说，没有见过点棒子不间苗的。我说：“秋后见，不信你就看！”结果到秋后摘棒子时，棒子都垂下来了；从老远一看，嘿！那个密！弄了 9 口袋，3 挑儿（一边一筐算 1 挑儿），共收了 3 挑儿！当时，还有我姥爷，我们家有个小平房，一会儿推一车来，一会儿推一车来，我姥爷瞪着眼睛说：“今年背棒子，一会儿往上背，一会儿往上背，背了这么多！”我姥爷驼背 90 度，爬着梯子看，说：“我的天爷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啦？怎么今年打了这么多玉米！”后来，我把情况给他一说，我们那里就开始种杂交玉米啦。结果，第二年买了假种子，人们上当了；这一上当，人们又认为不行。

问：第二年你种了吗？

英：那年我也上当了，一样。后来，我想：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假种子，不是真种子。第一年种收了那么多，第二年是种子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这几年，人们陆续又备下了种子啦，早已认识到杂交玉米的好处了。

问：那后来你怎么包起山来呢？

英：1993 年我承包栽树的事，跟我老出去开会有关系。我到过岭西，又到龙居村的一个支部书记那看过一次。那儿的山和我们这里差不多，土层一点儿也不厚；可王书记起步早，是一个建筑包工头。

问：王书记是男的还是女的？

英：男的。他那时条件不错，一开始雇了好多人打眼放炮，一

天才 8 元。他现在的树结果了，今年纯收入 2 万元。1993 年上面传达他的事迹，我们到王书记那参观去。说山上能栽树。我回村对大家说，咱们这儿必须以山为主，靠山吃山呗！村民们说：“你说的是真还是假？栽树究竟是长，还是不长？”反正他们没出去参观，起码咱们出去走一走，咱们有印象，他们没印象；都发动起来去参观，也不现实。后来，正好 1993 年 3 月份，我们村要招标承包这片荒山，搞试点呗。当时这座山上有 40 棵树，大队要搞点儿。承包时，我丈夫没参加，他在地打工。原先，我也跟他说过包山的事，我说：“刘国卿，咱们为长远考虑，为了对孩子有好处，造福子孙后代，咱们包片山吧！”他没说要包，也没说不包。他说：“你看着办吧，我必须出去打工挣钱去！”后来，1993 年一包，开始从 60 元往上包，谁都不报，就我和八队的队长竞争。山所在的地方不是我们队的，是八队的地方。后来跟那个队长从 60 元往上包，他长 10 元，我也涨 10；他涨 20，我也涨 20。生意场上无父子！谁包都可以，父亲和儿子可以对着承包。最后涨到 280 元啦。我就想吧：在 500 元之内，怎么着我也承包；过了 500 元，我还包它。当时，其实，我一分钱也没有；我就东借西借，借了一晚上，向乡里乡亲的借（承包得先拿现款，你包了，得先把款拿出来，签上合同）。

问：你承包了多少年？

英：承包 40 年。最后还是我获胜（笑），200 亩荒山，承包 40 年，每年交 280 元。整片山包了后，我丈夫没在家，村民中有人又说：“她男人没在家，一个家庭妇女，纯粹胡来，吃了撑的！什么她都搞新鲜的！”后来，我就给我丈夫做工作，我说：“你干脆别在外面干活了，赶紧回来吧！回来搞点长远的吧。”我还说：“工厂的职工有退休金，有养老补助；如果你想将来有退休金，这山就是退休金。山是摇钱树，山又是聚宝盆！十年树木，百年成林。”我又举例说，那儿那儿的树是天然的树，没有人栽，没打过虫子药，没上化肥。我看就这个生效益。刘国卿当时也不愿意回来，我就大道理讲呗！

白天讲,晚上讲,我说,为了孩子们,回来干吧;又说我到那儿那儿参观了,怎么怎么的。我说:“你也可以出去走走……”最后,说服他了;在外面挣钱不挣了,回来了。从1993年起,他一天都没有出去,正正业业的在家里包山,开始,我当妇联主任,还不像现在东跑西颠的,在家里干活还挺正常。承包以后,我们每天上山,这时,街坊四邻看见说:“山上栽树,胡来!”还说我胡来!可到了去年,李子树100棵,开花一片白!这会儿,人们一看,是发财啊!从去年开始,人们就是羡慕的眼光。去年不是太早啊!但这树长势特好!一施化肥,水跟不上,就不行;还得投入,大山上修过蓄水池,将山下的水抽上去浇树。去年,我跑到国卿二哥那儿去,他在定兴落户啦,搞得挺好的,他是吃“皇粮”的,我就一口气跑到那儿。我说:“二哥,你给我弄款去,我需要借3万,我包了一片山!”他亲侄女婿来,他就跟他们说:“你三叔包了一片山,需要3万块钱,你们拿钱赶快给我送来,你三婶儿带着走。”定兴县人家收入每人都是一月1000多,谁都经营个小项目,都挺富裕。我拿了3万,连人工费带树苗费,去年还弄了这个蓄水池。我上哪儿借去呀?你看,前两天家里闺女、儿子回来了;二哥还说,我需要多少多少钱,凑齐了,叫我带走。钱是借来了,但住宿费和伙食费都得用吧?我还找一个我叫姑夫的亲戚,找他借点钱,知道他是上海退休干部。我说:“借给1000吧!”他说:“行!”当时就拿出1000。现在我又贷款去了,写了个申请,找山区开发办,贷款能贷出来。现在你效益出来才能贷给你;你说先贷再搞去,不贷给你!银行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你越好,才贷给你;越不好,越不贷给你!借钱也是这样。你吃上顿没下顿,你借钱谁也不借;借了什么时候还呀?这都属于这样的。我想:我富了以后,把所有的贫困户都带动富裕起来,一个也不能叫他们掉队!一个穷得疲惫不堪,一个富得腰缠万贯,谁也觉得不忍心!带点儿头,给村里办点好事,都带起来,都富裕起来!这会儿人们都处于这种心理。就我来说,咱是大家族的成员,也想多找

点儿款,然后家家户户上项目;黄龙寺搞养殖效益快。争取3年翻一番。满城今年计划达到小康的标准,可我们黄龙寺也属于满城,我们是贫困山区;我们如果不奋斗,作为县政府来说,也受到拖累。县里每年都有达标的,每年都有步入小康村的。本来,小康县的小康村占三分之二,我们落后了;落后就被动挨打。所以,这几年我就猛往外跑,出去找去!一边上水利,一边上养殖。总起来说,使劲往前!这头绪,也不知先抓哪个。你们这次来,看到山山水水,下户咱们走走,你们给指出个明路,应该怎么走?第一步走什么?第二步走什么?咱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问:你这个思路是靠山吃山,现在没别的资源,只有靠苦干。只要汗水洒在上面,肯定有收获,而这个收获是持续性的,对生态的改善有益。

英:对,对!那真是。比如,从我们这儿出去40里,那里就出金子,勘探队给勘探出来的,人家老百姓都去挖金子去。据说,顺平离这儿也就20多里,他们那儿金子太少,开采这么点儿换不回来。我就想,是不是这个玉皇坨,面积这么大,里面是否有宝?你看满城刘胜墓,要不是部队开采就发现不了刘胜在那儿。我总觉得玉皇坨肯定是与玉皇大帝(笑)。我总觉得黄龙寺有宝。

问:你带头包山,是否村里人很多都着你学?

英:这是咱的职责,咱是一村之长!我是土生土长在黄龙寺;假如我生长在富贵人家,我也想不到这样。现在我总觉得时间特别紧。平常晚上看看书、看看报,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恨不得今天打井,明天出水,特急。总觉得效益不大,总想一下子富起来!(笑)信心倒是十足。

问:咱村里有利用山致富的吗?

英:当时还没有。咱村植树面积最大、植树最多的是我下面有一户搞一个经济沟,那是那会儿生产队集体干的,他把它承包了;他的树早已受益了,估计今年均(4口)纯收入达到1万。那是经

济沟,那是老书记那儿(龙塘)。

问:是不是给生产队一些钱?

英:他承包了,每年也是交承包费,给生产队。对生产队有好处,生产队有收入了呗。

问:村里有多少户致富行动起来的?

英:老太太们(指北京的“老促会”成员到黄龙寺扶贫的人)一来,开始村民不理解,现在不管谁来,村民都有些向往。她们来1个星期,时间特别紧。有时晚上还座谈,说和班子座谈,北农大的蒋教授来7次了,老太太来4次。来了后和村干部座谈,又召集生产队长会。我们一共12个生产队,我又下通知。老太太们一讲,大家都受启发。老太太们又说组织妇女们开会,我说,行。我们计生小组9个组的组长来了,还有妇联主任,有我们村干部座谈。老太太把心里话一说,一开会,小组长们那天就开窍了。明天又要开妇女大会;我们开村民会很困难,原因是没有报酬,开会一人给5块;就是1块吧,全村1100多人,得多少钱呀?咱们只能做做工作,不给报酬。可这次小组长起了作用啦,回去跟每个小组说,明天在哪哪儿开会,给咱们讲课传授技术,讲讲知识。那天,小组长们都发言了,说:你给咱们想个法咱们怎么富裕起来呀?——说话挺土吧?字话说不出来。村民都有个愿望,谁也不愿孩子下地,就是当农民也要当新型农民。怎么致富,这会儿都认识到了。蒋教授说:致富怎么富起来?谁都盼望自己的孩子有一技之长。她就给她们出话题,有的说,俺们孩子太馋,学习成绩不强,你给我出个主意,怎么让他听话?蒋教授是搞家政的,她讲怎么教育孩子怎么使孩子成才。后来9个小组长都听迷了。第二天,乡里的人来了,老太太再给我们开会,蒋教授领着乡妇联主任召开村里的妇女开会。结果,自古以来,没有妇女那么集中。这会儿妇女都想摆脱贫困,究竟怎么富还没找到。不过现在都说,我们生产队搞不搞承包?搞承包我们也包一片,种上树,效益出来了,都看,都学呗!搞

养殖的,最近我们村有发展到 17 只羊的,我们出点资金,现在都上小尾寒羊。还有的说,养猪行吗?我说,都行。养猪、养牛、养鸡、养兔……养殖受益快,当年受益。咱找到一部分扶贫资金,个人自筹点儿,不自筹就没有责任心。个人自筹点,周转金呢,再叫它周转出去。适当地提点儿管理费,用几年后,再周转出去。能找到这个,咱黄龙寺就变化了。个人自筹吧,像我们买那只公羊,筹集 1000 块钱,真是筹集不出来。现在村民都打工挣一点钱,这是点儿收入,就是有点柿子树也太少,企业没企业,地里这点粮食,养家糊口;能拿到扶贫周转资金,滚动也好,用两年周转回去。首先,种植可以自力更生,人工费可以不给他。可是树苗款啊,可以先启动。

问:像你这个水果摘下来运啊加工啊,考虑了没有?怎么卖出去?

英:设想?原先有个设想。咱们黄龙寺准备搞个柿子基地,沟里、地里栽柿子树;柿子在山顶栽吧,一犯风就不长了。柿子树不能上山,我们有这点经验。我山上的树有杏树,是仁用杏,杏树抗寒。山顶上栽仁用杏,山底下栽柿子树,以这两个为主,形成规模啦再深加工。光我这点吧,也不敢想,得找钱啦,才敢做深加工这个技术。以杏仁为主,杏仁都下来了,才敢上深加工的项目。现在不敢上,一上就赔钱。

问:仁儿用杏外面的肉不吃?

英:外面的肉薄、苦,只能做果脯,吃不得,只能以仁儿为主。为什么我想咱们这必须以仁儿为主?咱们这儿离满城 90 里,干果好储存。收获一多,它那果,瓜熟蒂落,落在地上,就吃不得了。这个有时间性,从摘下来到储存,再运到天津、保定,甚至上海,得有个过程,能肯定皮儿不烂吧?吃的是仁儿!要是少,咱到外面卖卖去,找个点儿,甚至通过亲戚朋友,像你们在天津,我给你们运了去,你们给我推销推销,只能利用亲戚朋友帮忙,主要是太少。要是形成规模啦,可以用三码,底下的三码可以上来。设想底下弄

个果木批发市场。有这么个设想,在乡政府那儿弄个批发市场,到时弄个小三码运那儿去,都可以。主要还是少。主要是观望,见效益了,大家就干啦。

问:可能大家都想干,就是缺资金,那打工的钱都干什么了呢?

英:这个山沟里,打工回来,买点面和米,供孩子上学。有技术的天天挣三四十块,有的挣20块,越卖苦力的越挣不到钱,他没技术。咱们这人出去的没技术,只能当当小工,抹抹小沙子和泥;越没技术越挣不来钱。春忙啦,点玉米可以回来,收玉米可以回来,出去一段一段的,越挣不来钱。还有的去砖厂,给人家弄弄泥什么的,卖力不小,挣钱太少。还有出去上当的,给人家干了三四个月,一分钱不给,尽这样的。他不出去没法生存;出去吧,不给钱;不给钱,怎么着?不能打他,不能骂他,也只能上当了吧?上当的占20%。

问:这不少啊,男的也上当啊?

英:嗯。他也不说不给你,你给干了活了,等我有钱再给你吧。跑着车费找去,离这90里地,找他要款去,他说:我这儿资金挺紧张,没有。他不给你,不能打他、骂他。“过两天再来吧。”来回车费,还得跑,甚至给不了。1991年,刘国卿给一个建筑摊儿上做饭,做了3个月,该着1000多块钱,一个月300块钱,吃饭不要钱,光车费跑保定花了60块钱。

三、人生

问:请谈谈你个人和家庭的事好吧?

英:我今年40周岁,属鸡,1957年9月初6生,高中文化。8岁上学,小学、初中都是在黄龙寺上的,那时每个村都有中学。高中是在岭西上的。那时条件苦,我跑宿,每周回家一趟。那时我是前三名,是数学科代表。

问:你从学生时就是班干部?

英：也不是什么主要干部，搞宣传，办板报，给老师、领导刻蜡版；领导、老师要是明天要，我今天晚上就得刻出来。那时老师都特“倾斜”我。有一次，我感冒发烧，没有出去跑操，老师查到了，我就说昨天晚上给老师刻得太晚了，老师说，那你就休息吧。同学们都说：老师们怎么都那么喜欢你？都挺羡慕的。反正那会儿在学校各方面表现都挺好的，考试总是考第一，字也写得挺好。毕业后，我就回到俺村当初中教师，那会儿还小呗。上高中那会儿挺艰苦，我一天才吃 8 两粮食，也知道家里老人种地挺辛苦的。早晨吃 2 两，中午吃 4 两，晚上吃 2 两。那时菜 3 角钱一份，咱也不敢买，从家里带点儿咸菜；汤 5 分钱一份，买那么一碗，就和着就完。家里条件也不太好，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走的时候，找点儿白面，烙点饼带去。

到初中当老师后，感觉有点委屈。那时当数学老师，后来，语文老师：“凤英，要不咱们换个个儿，你教语文，我教数学。”我说：“行，你说怎么教就怎么教。”这样，我们俩儿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一个正班主任，一个副班主任。我俩把这个班教得可好啦。那个老师数学可好了，比我好。教了一年半，那小孩子可特听话。我觉得教课也特有方法，在讲台上找开书一看，就知道孩子们谁在发坏，搞小动作；我马上合上书，把他（她）叫起来说：“×××，干什么呢，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他没有注意听，肯定说不上来。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们挺胆大，说：“小丫头教我，她懂得什么？”后来，谁都佩服我，佩服我那一手字，秩序可好哩。小孩子可乖啦。那时，我和孩子们差不多大，弄不好，学生都会打人；可是不，学生们可尊敬我们哩！我教学那会，一个月挣 260 分，7 块 5 角钱。

问：那会儿一个工分多少钱？

英：几分钱，不到 1 角钱。

问：你是哪一年高中毕业生？

英：我是 75 届高中毕业生。1976、1977 年教学。正在教学期

间,我们乡的石书记说乡里成立“八大员”——什么放映员、饲养员等,他说乡里要两名放映员,条件是能说会道,什么打快板啦,能歌善舞,得有文化。当时我也教文艺,全乡的音乐课我都承揽着。那时也小,嗓音也好,挺爱打点什么的。我正在教快板,书记来了,看到我说:“这小女老师多大了?正好乡里招放映员,你们村里不用考了,就是她了!”

问:那时,你们在乡里挣什么呢?

英:挣钱。一个月 15 块钱,村里仍给记工分。家里老人们都不同意,我执意要去。当时我想到乡里当放映员,反正在村里好,乡干部要比村干部高一头,所以当时还挺美。老人们也没有反驳,亲戚里道都说不如当老师好,教学有前途;放电影跑这跑那多辛苦。后来我去了才知道是挺辛苦的,真是不容易。白天得学习,晚上放电影也没个正点儿回来。有时,夜里一两点钟,把学习给耽误了,后来有考大学、中专的机会,我连试都没有试。也没有时间学习,白天检查检查机子,擦擦油,弄弄带子,晚上就得去放电影。

问:那时你们放电影用什么车吗?

英:没有什么车,我们是“赤脚放映员”,上哪儿去都是步行。肩扛着放映机,翻山越岭的,也不觉得累,还感觉挺有意思。当时是串村放电影,放前给老百姓说说,做点影片介绍。我一直做了 15 年的放映员,我们结婚时我还在放电影。

问:你们结婚是什么时候?

英:1980 年。

问:你和你丈夫是怎样认识的?

英:说起来话长——那时村里人没有人敢给我提对象。

问:是不是看你长得漂亮,又有文化,还在乡里工作?

英:反正是当时没有人提。在外面工作倒是有人给提。我到
一个部队的驻地去放电影,有一个副指导员,个子矮一点,是河南
省的人,有才,特有才,他看上我了,就对他们首长说:我去接放电

影的小刘。接送了我3次后就向我提亲,和家里一商量,说不行,太远,就一个闺女。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去了。当时咱也小,没考虑过这种事。那时认为,他人材长得不好,心眼肯定不好;那时我就想找个美男子。后来他又来接过我两次,我就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从那以后,就没有联系过。1980年,我弟弟当兵去了,我哥又不怎么顶事(抽风、大脑有病),我还有姥姥、姥爷。我弟弟走后,我姥姥家和我家全靠我一人张罗。1980年我姥姥去世了,我姥姥有病,半身不遂,卧床3年。我姥姥去世后,我姥爷老哭鼻子。大年初一,我去我姥爷那儿玩,看到我姥爷和舅舅都没吃到饺子,两个人啼哭,我也跟着哭。我心特软,看到我姥爷没吃到饺子,心里挺不是滋味。后来就和我爸商量,要不我跟我哥换一下,让他回家来,我跟我姥爷过。那时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也不知道孝敬老人有好多;当时我就是考虑我姥爷是一家人家,就过去伺候他们了。当时,我心特软,我去姥爷家,我姥爷总哭,哭得我实在没法子,一个女孩子去哪儿找不着对象?最后找“上门”的呗!伺候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感觉到什么酸甜苦辣的。这正月里,谁家吃的也不次,可我姥爷家,姥爷有病,家里太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过了一段时间,村里追求我的男孩就多了;我和刘国卿的结合,在他看来也是天方夜谭,他也不敢追求我。我们两家的距离不远,都在八亩台,我们又同岁,我比他高一班从小就认识。虽不是青梅竹马,在一个村都相识,都了解。他一表人材,当时,他长得又高又粗,眼睛挺大,乍一看就像王洪文似的。最终我还是看上了他。他父母对我本人很满意,但觉得家里条件不好,去了肯定吃苦,最后他父母也挺愿意,我父母也愿意,就算解决了。

问:是你们俩儿先看上的吧?

英:也算是吧。当时,我没有选择,一般的都不敢给我介绍对象,人家总认为我农村的一定不说。后来,我要不是上姥爷家去,和刘国卿绝对成不了。当时我的选择是搞出点事业,可家里条件

所迫,非要我找个上门的女婿赡养老人。3月我们办了结婚手续,7月我们就结婚了。把我舅接过去了。摆了个摊儿(指摆婚姻宴席),庆贺庆贺吧。我们结婚时我娘家爸爸弄了60斤面,乡里乡亲的喝喜酒呗。我姥爷家里那时穷得连个“摊儿”都“摆”不起。结婚得“摆”几个菜吧?当时他们的条件连吃的都不够。我母亲就给点儿,婆婆给点儿,就这么生活。总起来说,我们感觉苦中也有乐;生活苦点儿,也没伤感情。结婚一年后,就生了我们闺女;从此以后,不说是走进了死胡同,也是一切都断了。

问:舅舅没有结婚吧?

英:没有。他们是雇农,我们也是雇农,就穷到那种程度。他们家的房子是我们出钱给盖的。那会儿他们特苦。

问:你们家原籍是易县?

英:是,离这儿不远。我爸爸后来来这儿的,原籍在易县。

问:你爸爸是“上门”的吗?

英:我爸爸算落户,不是上门。我们家老家离这儿不远。

问:村里上门的多吗?

英:有几户。有的家里没儿的,和我们不一样。

问:你家里姐妹兄弟几个?

英:女儿就我自己,还有1个哥哥,1个弟弟。

问:你们的孩子姓刘?

英:嗯。我们两人都姓刘。不见得都姓母亲的姓(按:指招赘婚姻),我不这么认为,非得姓妈妈的姓。

问:结婚以后又出去工作啦?

英:没有。要不结婚后倒霉就倒霉在这儿啦。那时,我爱写作,在岭西上高中的时候,那会儿都是前三名,我是数学科代表,学校的领导、教师对我印象特别深。结婚后,糊涂啦,一天天上地里去,我没有怨天怨地,我根本没有。我吧,我就想,我不去我姥爷家,命运可能比这好一点;命运是个人把握的,该闯还得闯!把你

撂福地里,你不能干还得吃苦!结婚之后,我的志向是学点儿裁缝,公公也出主意,婆婆也出主意,男人都不让去,我姥爷也稀里糊涂。放电影也不是常去,隔着十来天去1次,没有多少钱,那时放一场才12元钱,除去吃饭、车子磨损费,也剩不了多少钱。婚后,我不觉着有什么前途,全给割断了。1981年我生了闺女后,一日三餐,一封闭就封闭了15年。可怜的是,进我姥爷家的门儿,粗粮都不够吃。结婚后可受苦了,我姥姥家、娘家甚至他家,我都不愿张口要。丫头3岁时,我又生了个儿子,那时我还在放电影。儿子刚会走时,我们把旧机子淘汰了,于是就一点儿收入也没有了。我想:我有能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呢。我想出去闯闯,做点儿服装啊,搞点别的生意啊,家里人有封建意识,婆婆不让出去,公公也不让出去,姥爷不让,舅舅也不让出去。我家丈夫更不用说了,思想不解放,总觉得女人出去人大心也大。社会啊各方面都变化了,封建意识还在。后来,我对丈夫说:“不行,你赶快到外面打工去。”我说,人生都有转折点,能转折到什么程度呢?今天我这样,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呢。孩子太小,我姥爷还有个病,白天挺好的,晚上就尿床。我结婚以后就给他洗尿布,隔几天就洗一次,不洗屋子里就有味儿,从来没有嫌烦。我姥爷不是亲的,当时我们家是四世同堂(按:这里不是指上下代际间的关系,而是指4个家族的人组成一个家庭)——我姥爷姓晋,我舅舅姓刘。我亲姥爷死后,我姥姥带着我妈和我舅舅进了姓晋的姥爷的家,这么组成一个家。我从来没考虑过我姥爷不是亲姥爷,对他虐待什么的。我进我舅舅的门,我姥爷才73岁,我伺候他到85岁上,到1992年去世。在咱村都异口同声的(按:赞扬),他病了6个月,擦屎擦尿的,姥爷瘫在床上,该擦尿时擦尿,该喂饭时喂饭,在床上整整瘫了6个月。这么多年,我也不能出去。我姥爷驼背近90度,但也能帮干点什么——看看孩子,烧把火,做做饭什么的。我舅舅耳朵不灵,干活儿也不快,没说上媳妇。后来他出来打工,我就把孩子给姥爷看

着,我和舅舅下地。当时就有人说:看她一阵风就能把她刮倒的,也刮不倒了;看她东坡上西坡下的……当时,也是孩子太小。

问:你什么时候又出去了呢?

英:后来,我姥爷去世了,我才解放出来。我在家里也掏过大粪,别人也笑话我,说:“看刘凤英掏大粪了!”他们是想,看她还有文化呢,不还是得掏大粪?耕地、耘地我都干过。就这样,年复一年,打下的粮食还不够吃。其实,国卿他们兄弟姐妹过得都挺好的,他们用得着我的时候,我很愿意帮助他们,我能给他们做些衣服。别人要是做衣服找到我,我也愿意帮忙。

问:你怎么学的做衣服?

英:我想,自己有文化,买本书自己看,这多少,那多少。别人买块布料,拿个样子,我就能给做,也没有要过钱。

问:你自己有机器吗?

英:我娘家有,把我娘家那个搬过来,我不要,我只是用用。小孩的小鞋,从我们姑娘那会儿我就给她做,别人看见了,说这鞋挺好的,给我吧。我剪裁也不少,布条很多,别人说,给我来点儿布条给小孩做鞋。反正我手也松,我说:行。别人要我替个鞋样儿,做双小鞋子,我都答应,反正我也挺勤快的,帮助乡亲干点儿事呗。那会时兴青年头,我也帮他们理发。

问:你是怎么学的剪裁缝纫?

英:1992年,我姥爷死后,我就从亲戚那里借了500块钱,把孩子放到我妈妈那里,背着被子到石家庄学剪裁。我跟我弟媳说:“孩子撂你这儿,该打的打,该骂的骂!”那时国卿在保定给人家做饭,我跟他说:“我到石家庄学剪裁,你愿意吗?”他说:“学什么呀?咱家也够吃的。”我知道他不愿意,趁他不在家,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学校的食宿条件特别差,自己在那里也舍不得买份菜,每天只喝大米粥,一次买了两个油条,吃后肚子就不得劲了。我想,可能肚子太空了,稍微有点油水就不行了。我在那里学了20天,回来

以后,就承揽村里的活儿,每天晚上都忙到很晚。我一个小时就能做一条裤子。那年挣了四五百块钱,忙到大年三十。过了初一,我才给家里人做。那时,我早担任妇女主任的工作了。

问:你们家种有多少地?

英:我们地不多,一共有6分地,但那天我算了算,有6分地分成15个地方,一分地也得去。不管怎么着吧,总算熬啊熬出来了。这15年,那时还养着牲口、猪、鸡……也养过兔和鸡,都失败了。有一次,我上七八里地的地里耨地,就对孩子说:中午就让你姥爷给做点饭吧,我就不回来了。自己打着伞去了。那时,我想:人有什么意思?我们长在山区,也离不开山区,看着一望无际的大山,我就想要是把这些荆条刨了,种上药材有多好!那时只是想,根本没想过闯闯、试试,也没想到栽树。

问:你家里外头负担这么重,你是怎样处理的?

英:孩子有时给我婆婆,有时给我妈妈,东一天西一天的就这么撂呗。抓计划生育工作挺难的,老百姓也骂大街,可是我度量大,怎么骂我都不在乎。后来,1993年初,我到岭西,看到他们的果树早受益了,我也到过龙居村看过他们的植树造林,看到他们承包的荒山,长得都挺好,回来就给队长说说,可自己得首先带头干起来呀。1993年3月,有这样的机会我就承包了一片荒山,当时国卿也不在家。以前我也跟他商量过要包一片山,我说:山是聚宝盆,一本万年利。他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我就从280元的价钱把这片山承包下来,大概有200亩。当时山上有40多棵树,社员们一听说大队要把山包出去,当天晚上就把树都刨走了。

包了后,我就跟国卿做工作,我说回来吧,别打工了,这个才能致富,这个才能养老。我吃饭也说,睡觉也说,最后终于听了我的,跟人终止合同回来了。1993年就开始栽树。到县里,我跟县农林局局长说:“我是黄龙寺的妇联主任,我得带头致富,我只带了200块钱,无论如何您得给我解决点儿树苗。”这个局长挺诚实,给了我

400 棵树苗。1993、1994 年天都旱，得给山上担水，别人看这样就都笑话，说：“丈夫不在家，这女人就成精。包山啊包树啊，听老娘们儿的，这女人当家就是当不了！”他们就是瞧不起妇女。后来国卿就说“想啥啦？弄这个，这还发了家致了富？”闹气呀，闹气终归闹气，该干还是得干。这几年，过了正月初五，我们就开始干。没黑没白的干。后来乡亲们看我们这么干，就说“你们给我们不用做什么好饭，只喝粥就行，我们帮你们干！”我一听这个，知道乡亲们真正想帮我们干，于是从 1994 年开始，我们就请人帮助干。一干就是 1 个多星期，后来，面、肉、油都吃光了，米也吃没了。生活上特别苦，我们自己炒点儿白菜，倒点儿酱油和香油，就这么吃。馋得我们两个孩子一天都不上家。三四个月不沾一滴油。对我来说，有时也想，光投资，不受益，也挺心灰意冷的；但又想，再没信心也得一竿子插到底，干不成，半途而废，这不丢人吗？

1995 年，我们又请人开山栽树，那年栽了 1000 多棵。1996 年我就想，如像 1994 年那么旱，咱们的汗算是白流了。这样吧，咱们的汗算是白流了。这样吧，咱们在山上弄个蓄水池吧。找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估算了一下。这个蓄水池造价得 1 万多块钱，光工费就 7500 元。不管怎么说，1996 年麦收，池子终于修好。后来我到国卿他二哥那里借了 3 万块钱，到现在修池子的钱还欠 2000 元。1996 年我们卖了一个猪，没见到钱就让人拿走了。

1997 年，池子早已修好了，可树还是栽不好。我们还得借钱。到八月十五日，答应给齐人家工钱。我们这贷款也不容易，还得要回扣，我每天东跑西颠地去借钱。不管怎么说，到 1997 年，我们从山脚到山顶全栽上了树，树缝间还种了谷子、黄豆、小豆、萝卜。今年天气旱，山上的树也有死的，我们又买了个泵，120 米管子，这些又花了 1 万多。可这山土质太次，不吸水，今天浇明天就干。好在我今年有点时间，成天到山上去浇树，中午也不下山，国卿他给我送饭。有时，浇着树就睡着了，醒了以后接着浇，确实不容易。

问：请谈谈你是怎样当村干部的好吗？

英：1985年，我开始当妇联主任兼团支书，1995年，我村计划盖一所学校。1995年推荐我到老促会举办的培训班培训，一共集中了80名妇女，我也挺幸运的，作为村妇联主任去了。当时我去时就有人说：你去得给咱村带点效益。我说：行。去了之后，我真上火了。我们住4层楼。平时我给老太太们打水，中午跟老太太聊天。我就写了一份材料，也不太成熟，哪个老师上课我就给他一份。别人都说了，怎么老看这个女的往老师那儿跑？每个老师讲后我都找他们，把黄龙寺的情况说一下，问能不能给我们解决点资金。晚上我就抄材料，为了第二天给老师送。后来我就反复找老促会的吴主任，跟他说我们是山区，光靠出去打工永远发展不起来。要想改变首先得抓教育。后来老太太们也没有办法了。后来，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金处长给我们讲扶贫、什么“光彩”事业，我一听，这可有门道了。于是下课后就去找他，我就把想盖学校的愿望给他说了。金处长就把我的想法说了一下，龙居村的村长当时站了起来说：“我们学校虽盖起来了，但内部桌椅还没有。”金处长看我们两个都站起来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找来李部长说说我们两个村哪个村最穷，李部长说，黄龙寺最穷。后来金处长答应给我们5万；吴主任让我说说我村的具体情况，我说具体情况也说不清楚，让我们村长来吧。后来，由县里牵头，1995年我往北京跑了17趟，石家庄跑了五六趟。那一年，为了这个学校，我一年没上家，总算跑了13万。1996年又开始跑。说起跑教学楼那个苦劲儿呦！有一次，从保定坐车上北京，早晨也没有吃饭，我以为车上总有卖吃的。到了北京之后，一下车我就歪在车上，后来下车吃了点饭才好了。我把这件事跟老太太们一说，她们都很感动。

问：作为女干部，出来跑别人怎么看？

英：反正别人说什么的都有。

问：你是什么时候当村党支部书记的？

英:是1995年,也通过乡里任命。1996年为了工作方便,我和老书记换了个个儿,我当村长,老书记又当书记。当村长也罢,当书记也罢,不管怎么说,事业总是要要的。咱们女人吧,也有自尊心;一个事,说完成就得完成,完不成就比别人矮半截子。

问:你当村干部感觉有什么特别的压力吗?

英:当时村里也有风言风语的,一出去就是老书记和我,一男一女。有人说:女人出去,她不是仗着是个女人她才办事呀!我想,脚正不怕鞋歪,说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想,作为一个女人,能为人们办点好事就是不简单。咱总想,人活一生不能白活,总该有点追求。有时,对人们的闲言碎语,也着急上火,1995年急得我牙疼嗓子疼。当时出去,回来人们对你不满意,看见你,瞪你两眼。可你也不能说,话只能往肚子里咽。

问:你这些委屈只能给家里诉了?

英:这些话我从来没说过,男女之间有些话没法说,有些话不能说。他总是默默无闻。不管怎么说,等事业成功之后,就会真八大白的。现在我们两个在工作上有些矛盾,人们又说:原来他们俩儿有矛盾。这才一清二白。作为女人干点事真不容易。

问:你当女干部,经常和男性接触,你感到哪些地方不方便,比如抽烟?

英:对男人吸烟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比如男人跟男人开玩笑太过分,我就装没听见。作为支部书记或是村长,生产等知识什么都得懂,这些都得学,累得我疲惫不堪。甭管怎么着吧,村里的工作还没有下降。当时忙得真是……也想看书报,你说村里有什么民事纠纷,你不得去说两句吗?每天都得学习。1996年为了完成建教学楼的事业,我主动跟村长换位,到后来乡里同意了。结果1996年村里的工作特别顺利。我想,女人有没有能力,不是说出来的,得用事实说话。

四、村民

问：咱村人们对生男生女的想法怎样？

英：生男生女，现时间人们的观念都淡化了。我们山区允许生两个。生两个女孩、两个男孩都一样的结扎。

问：人们知道有妇女继承权的法律吗？

英：咱这儿一般是妇女嫁到男方，不存在妇女继承财产的问题，要是女娶男，则由妇女继承。

问：村里“上门女婿”多吗？

英：有几户。有的上门是儿子找不着对象。

问：现在还有早婚的吗？

英：农村一般结婚比较早，一般女方在 20 岁结婚，够规定的结婚年龄就结婚。

问：有不到结婚年龄结婚的吗？

英：现在没有，差一天也不行。

问：咱村家族的观念怎么样？

英：一般在红白喜事上联系较密切，其他的事也帮，本家的观念挺明显的。确实，这种观念很陈旧。

问：你们家都有哪些经营，收入情况怎么样？

英：养猪，一年能收入四五千块儿。

问：在你们的收入中，你创造多少？他创造多少？能分清吗？

英：我觉得他创造的比我创造的多，因我总不在家，猪呀、山呀，都是他投入的多。他把他的劳动都存到山上哩，到时候就取出来了。

问：咱村里的男的一般都出去打工吗？

英：一般都出去打工，能占到 80%。

问：你感觉他们这些出去的人回来有什么变化？

英：也有学好的，也有学不好的，但大部分还是挺稳当的。有

的出去打工,出去学点技术,带点技术回来。

问:村里人对这些打工的人有什么看法?

英:出去打工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出路,孩子上学都得花钱。——我不这么认。我觉得出去打工不是长远之计,要不当初我贷款过日子也不让国卿出去。我说把苦力卖在家里,若把苦力卖在外头,到老了就没有保障。

问:你觉得这里的人际关系与以前比有什么变化?

英:也许是经济条件比较好吧,谁家里有病人了都买点东西去看看,有点什么事也去帮忙,反正互帮互助的事挺多的。

问:社会治安有什么变化?

英:也有一些小矛盾,但大矛盾没有,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能解决。大事没有,村风较正。

问:你这些年真为村里做了不少好事。

英:这是应该的,咱是个党员,这点子事算什么!

问:咱这有电视的有多少家?

英:能占到三分之一吧。一般也不都是买的,有亲戚朋友退役的旧电视。

问:那乡亲们都爱看些什么节目?

英:现在村民们对咱干部要求的特高,说:你不行咱也买个“大锅”(指卫视接受器)!我说:行!这学校造价38万,到现在还缺10万,——也不敢想。我想装电视天线需要3万块钱。有的村民说,把路铺上吧;有的说,把电话装上吧……关键是村里没效益,不敢贷款,害怕还不起。

问:你觉得有电视和没电视对村民有什么影响?

英:有电视一般只能收1个台,能看些节目。比如,香港回归,董建华出来,就议论纷纷。香港给龙居村25万,这村民们就知道了,是通过电视知道的。

问:咱这常见的地方病有些什么?

英：甲状腺、关节炎、妇女病，一般都是劳累过度引起的，人不是铁饼子。有的妇女得妇女病是由于老头儿（指丈夫）们出去了，生孩子在家里自己养得不好。

问：咱这儿女人生孩子一般在哪儿生？

英：在家里生的多，要是难生的也往医院里生。我生这两个孩子真好笑：1981年生姑娘的时候，她爸不在家，生了4天以后，给她爸捎了个信儿才回来的。生时，跟前一个人都没有，都是自己弄的，我多少知道点儿生理知识，后来我们街坊听到小孩子的哭声才来。生小子时，他爸出去买东西了，后来时已经生啦，也是我自己弄的。生了之后，我姥爷把接生婆接过来给弄好的。

问：咱们这儿妇女教育状况怎么样？

英：也有文盲，有的是因为家里姐妹太多了，上不起，也有受过教育的。

问：你觉着应对妇女进行哪些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英：怎样教育孩子，咱农村也不太懂，有时打，有时骂，一啼哭就赶出去了，这也不是个方法。再有给妇女讲讲作为一个女性不容易，应该自信，不能自卑，得有点想法和追求。最主要的是告诉妇女，女人比男人强，不能指望躺在男人的怀抱里享清福。首先认准了的事要一竿子插到底，你要退就会有人歧视，别指望花男人的钱，得自己闯闯，在家里只当贤妻良母不行，得想方设法抓点经济，抓点经济才有地位。不管怎么哪方面都比男的强点儿。

问：你想怎么改变家乡呢？

英：当时我出去做服装，一年也能赚1万块钱。当时新结婚那会儿，种地直把我种伤了，不想种了，咱出去，也不忍心。今年40岁了，精力也不像以前了，也不愿意出去了。我总想把这片山利用起来。我们那片山能长，所有的山都能长，开出来以后愿意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养鸡、养猪、搞企业等，应百花齐放。早一点富起来早一天省心。咱作为一名党员也还总有点党性，想为家乡做点贡献。

问：你觉得最不方便的最需要改造的是什么？

英：首先把精神文明搞好，思想一致了，事业就能上，以后的工作步调就一致了。我想买个高音喇叭，到时放放广播，把妇女组织起来，像去年的扭秧歌，显得咱村里有活力。再安装有线电视，使人们接受点儿外部信息，换换脑筋。以后还打算建旅游区，让来过黄龙寺的人、没来过黄龙寺的人享受享受，对曾给黄龙寺帮助的人免费。只是现在，浑身是铁，能捻几个钉？想的挺多。去年村里拨了1000块钱给我和老书记，说作为出差补贴费，我跟老书记说：“咱们是党员，你也不能要，我也不能要，咱把这钱还给村里。”于是买了锣、鼓，从腊月二十九就开始扭秧歌，黄龙寺一下子就有了生气，看着可活跃了，甚至在屋里打麻将的都出来了。老人、小孩、青年人都扭。

问：在结束访谈之前，我能问几个个人的问题吗？比如，你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英：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大伙，献给别人，别人就尊重你了。

问：你最担忧的事是什么？

英：是事业不能完成。

问：你认为什么才是成功的女性？

英：有雄心壮志，实现诺言，达到目的就算成功的。

问：你认为你现在是成功的吗？

英：不成功，还欠着远呢。

问：你认为你的家庭生活还是幸福的吗？在家里谁说了算？

英：可以吧。在家中我有三分之一的功劳。自古以来总是男主外，女主内，对我都不一样了，我在外跑的时间挺多的。家庭中谁说说得对就听谁的。

问：你认为什么样的男人是好男人？什么样的女人是好女人？

英：男人对女人忠心，作为女人也能对得起家庭，对得起丈夫。

我们家老的和少的都挺和气

被访人：刘巧云(云)，刘永春(春)，刘俊荣(荣)。

时 间：1997年8月2日晚。

地 点：刘巧云家。

访谈人：王琪，李家福，方炼。

录音整理：李家福，任晓坤。

刘巧云夫妇是刘凤英的父母，刘俊荣是他们的儿媳妇，他们一家又是我们的房东。这是一家和睦的三世同堂的家庭，还有一个有病的大儿子。俊荣的丈夫在外工作，她非常干练，曾提任过村里的妇女主任(凤英的前任)。

问：大娘，您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啦？

云：刘巧云，今年65岁。

问：大伯，请问您的大名和年龄？

春：刘永春，我74啦，我比她大9岁。

问：我们想知道村里人怎么过日子，比如老伴对你的看法和你对老伴的看伴，家里谁主事？

春：我主事，我是当家的。不过，我们家关系不错。小荣是我们儿媳妇儿，他哥哥有点毛病？从儿媳妇来了，和她婆婆没有红过脸，没有抬过杠、吵过嘴……

云：没有。

春：在钱的上面，小子挣了钱也给我，给她零花钱给多少我也不管，当老公公的也不过问，交给我多少算多少。不过，大部分钱都交我，给她点零花钱。

云：买点东西衣服什么的。

春：买衣服什么的，她手上有的花的。没有，就找我要，反正花多少拿多少，我也不问他们，该买什么就买什么呗。老的和少的关系都挺和气，没有今天怎么不好，明天给你一个模样什么的，我们的家庭比较和气。

问：您有什么事和老伴商量吗？

春：商量。

问：咱们家什么事听大爷的，什么事听您的？

云：家里该买什么就买什么呗，你说该买什么啦，买就买呗，商量着办吧（笑）。

问：从年轻时候就这样，没娶儿媳妇以前也是这样吗？

云：以前也这样。

问：（对春）钱都掌握在您手里？

春：嗯。

云：钱也不在他手里。钥匙就在他外头，他不在家，你说买什么东西，开门买了什么再放回去。

春：有个锁，钥匙就在他外面，谁花谁就花。她妈在家，儿媳妇说买什么，给我拿个钱儿；她妈不在家，个人拿也行。

云：钥匙就在他外面摆着。

问：你们这个家真好。像这么好的家庭村里有多少？

春：个别的也有家不和的。

云：有。

春：农村里这个也有。

问：（对云）您什么时候嫁给大爷的？

春：我从1949年那年从部队下来，那会儿我才28岁，可能是

1950 年我们就结婚了。(51 年?)

云:我不是 19 岁,就是 20 岁。

问:您就是当村的?

春:她就是当村的。

云:嗯。

问:是媒人说的?

云:那时还封建着呢。

问:原来就认识吗?媒人一说就愿意啦?

云:当村的,认识呗。

问:(对春)您家里哥儿几个?

春:哥儿仨。我是老大,老二死了 30 年了,还有老兄弟。我们从小家里特穷,挺苦。我父亲死了以后,我母亲把我老兄弟带走啦,又找了一个,带出去,找了个茬儿,给了人家缺人的呗。

问:把老兄弟送人啦?

春:嗯。这会儿还有我老兄弟啦,过年还来过一回。

问:他知道?

春:嗯。在完县。

问:走时不小了吧?

春:不大,六七岁。

问:那他怎么知道的?

春:听别人说的呗。

问:平常也来往吗?

春:来过。

问:那就剩您哥俩儿了?

春:嗯,哥俩儿。那会是北房,比这房矮,我兄弟在那房住着。父亲死了以后,盖了这房,挺不相称,太矮,就把它拆了,又翻修。

问:您父亲哪年去世的?

春:1940 年,还有日本人在的时候就死啦。

问：您先当的兵？

春：嗯。我先当的兵，我当兵以后父亲就死啦，母亲改嫁，小弟送人啦。就剩下二弟，老二要饭吃，没别人啦。

问：您复员以后……

春：复员回来给点安家费呗。

云：买点儿大米，买点什么，盖了个小草棚儿，找栅，栅了栅，那会儿，就是那个呗！

问：盖了个小草棚，就把您娶来了？

云：嗯（笑）。等媳妇儿来了，才翻修了这个房。原先也是瓦房，比这间量小，窗户、门也不是这样的，小窗户。

春：我这房才翻修了四五年，现在还可以。

问：（对云）您娘家原先困难吗？

云：我娘家困难，没有什么。

问：兄弟姐妹几个？

云：兄弟两个，我和1个弟弟。

春：凤英跟了她舅舅，过继给她舅，还养着她舅舅。

问：她舅舅没孩子？

云：没寻人（即未结婚）。

问：为什么？

春：穷呗。

云：我妈那会儿有病，死得也早。

问：您多大时母亲死的？

云：死了20多年了。

问：您父亲呢？

云：我3岁上父亲就死了。

问：刚解放时您嫁给大爷，是不是觉得挺高兴的？（云笑而不答）

春：什么也没有。尖尖房，栅上一道栅……（云插话：茅草房）
嗯，茅草房。

问:(对云)您那时没嫌这儿不好?

云:俺们家也穷。

问:您结婚是骑毛驴过来的?

春:也算骑毛驴。其实她娘家就在你们吃饭的那儿(西沟口)的下边。

问:那也是骑毛驴过来的?

云:嗯。

春:那天没有骑毛驴,我们俩结婚时登记,去村公所,村公所在岭西。俺俩的介绍人,我表弟是北洼的,介绍人跟着去登记,骑着毛驴去的,回来就见直奔我这儿来了。那时候很简单,我们结婚时铺的没铺的,盖的没盖的,哪像这会儿啊?

云:借的一个被子,什么也没有。

春:家里被子都不够,做新的做不起。

问:安家费买了点什么?

云:买了几根木头,柜儿……

春:安家费也不多。

云:二五眼(马马虎虎之意),买点乱七八糟的,还有什么?要什么也没什么。

问:那时早就平分啦?

春:早就土改了。

问:(对云)结婚以后,您下地干活吗?

云:干活,那会儿干活。

春:那会儿不干活儿不行,吃食堂,1958年吃食堂,挣分吃饭。弄着孩子也得劳动去,不干活,吃食堂不给你打饭。

问:1958年那是人民公社时,人互助组、人社时干活儿吗?

云:干活,不干活还行?

问:评工分您一天记多少分?

云:一天6分呗。

春：我们男劳力上下午 8 分，早晨 2 分，一天 10 分；她们妇女们白天 6 分，早晨 1 分 5，共 7 分 5。（云插话：整劳力。）有的挣不上，有挣 5 分的，有挣 4 分的。

问：分也得评吧？

春：评分。

问：那您是妇女中的整劳力？

云：嗯，那会儿我可能干啦，男的们耨地，我和他们一块儿耨，男的们拉不下我！那会儿也是犁地什么的。

问：干完活儿回来谁做饭？

春：谁做饭？女的做饭多，我也帮着，一块回来，两人一块做。

云：两个人一块做呗，他带孩子我做饭，一边看孩子一边烧火，吃了又走。他当队长，走迟了怎么领导别人？

春：我当了 18 年的队长。我不当了以后，换别人当队长，没有过两三年的，一年一换，甚至当 2 个月就换了。后来，我的小子当兵走了，我就在岭西部队上做饭，当厨师。一直当了五六年。后来，小子回来了，我就回来了，不在外面了。

问：大爷一天到晚领着干活，家里的事全是您干吧？

云：可不呗！我干活，人家歇着，缝纫机赶紧做，也不太会做，吃了赶紧走。不干头里去，怎么说别人？

问：您支持大爷当队长吗？

云：嗯，当了 10 多年。

问：因为家里活儿顾不上，吵过架，红过脸吗？

云：没吵过。

问：从来没吵过架？

春：没怎么吵过，两口子过日子，也少不了拌个嘴什么的。

问：拌嘴谁让着谁？

春：都不说就没事了。

云：谁少说两句，谁不吱声就算了。

问：您生孩子谁给接生？

云：没什么接生的，生了就得了呗！

问：3个孩子都是自己接生的？

云：嗯。

问：咱们这里像您这么大岁数的妇女生孩子都不请人？

云：嗯，没请过人。

春：有老人的，老人给收拾，没老人的街坊。

云：生大儿子时，他（指丈夫）收拾的。生凤英和她弟弟，就是裹上包裹扔在炕上就得了呗！

春：丫头那会儿就是我收拾的，把脐带剪了后……

问：就拿家里的剪子，也不消毒？

云：嗯，没有。

春：老百姓，剪了脐带后，绑上止住血。绑上后，把孩子包上，撂下。给产妇做点吃的，不吃受不了，煮几个鸡蛋。

问：过去说男的、丈夫不许进屋，孩子生完后丈夫才能进去，咱们这没有这个规矩？

春：没有。咱们这有婆婆，老婆婆给接生；没有婆婆，一般是丈夫给接生。

问：生孩子在炕上还是在地上？

云：在地上生的。在地上生完后再拾掇到床上。

问：地上铺东西吗？

云：不铺。

问：都是站着生吗？

云：嗯，坐在木墩上生的，在炕根生，生了拾在炕上。

问：坐在木墩上？

云：坐蒲墩。

问：您生3个孩子都是这样？

云：嗯，这会儿在炕上，那时不这样。

问：伺候月子都是谁？（对春）都是您伺候的？

春：那可不呗！

云：他会做活，那会，纳底子他就纳。开会，开党员会，开着会拿着底子就纳，开一回会就纳一双底子。

问：村里男同志纳底子的多吗？

春：不多。

问：那您怎么会做？从小锻炼的？

春：从小锻炼的呗。

问：没有人笑话您？男的还纳底子？

春：笑话什么？

问：当兵前就自己纳底子？

春：那会儿不，我16岁当兵。

问：那您什么时候学的？

春：当兵那时候很艰苦，自力更生，我还会纺棉花线。我在部队那会儿20多岁，在东边的献县站着织毛衣，自力更生。团里自己组织一个手工摊儿，弄点棉花，纺了线个人织。

问：在部队上学的？

春：嗯，织袜子、织手套、纳鞋底儿……

问：您都会？

春：都会。

云：他会织袜子。

问：跟您结婚后，自己还纳底子？

云：嗯，我纳他也纳。他纳他自己的。

春：没怎么给孩子们纳，孩子的底子小，我的鞋个儿大，底儿厚。

问：您是不是心疼老伴，自己纳？

春：顾不上，我着急。

云：我那会儿娘家妈有病，我兄弟也得照顾着，就累得慌不忙不？就帮着纳呗。

问:(对云)您生孩子几天下地?

春:生孩子怎么也得满月才下地。女的们生孩子过早劳动不行,吃的什么都得注意,吃凉的不行,吃热的不行。

问:(对春)月子您伺候?

春:那可不。

云:没有老婆婆。

问:有没有老婆婆的丈夫也不管,像栓虎的妈,两天就下地。您生3个孩子都是满月后下地的?

云:嗯。

问:咱这时兴给孩子做九吗?过满月吗?

云:没有。

春:有的亲戚“送汤”。

问:送什么?

云:送挂面。

问:过满月那天?

云:第三天、第五天。

春:一般的就是谁谁生了孩子啦,弄几斤挂面,弄斤红糖吧,亲友们买点布吧,时兴那个。

问:过去就送?

云:风俗呗。

问:是亲戚、邻居,还是沾亲带故的送?

春:沾点儿亲的。

云:不沾亲不带故的,去就去,不去就拉倒。

问:请吃饭吗?

云:请。

春:有的不吃,送了来就走,多数送来了,让人家吃点儿。三天五天买点儿菜去,生了孩子人家送汤来了。

问:您生了3个孩子,每次都这样吗?

云：嗯。

问：过满月还送吗？

云：不啦。

问：三、五天送，有什么说法吗？

春：四天、六天不让送，四、六天送，小孩不是有得四六风的吗？
过了六天以后，哪一天都行。

问：咱这儿是不是孩子抽风死得多？

云：多呗。

春：也有，不过古来传下来，不一定一去就一定死，不过老一辈的风俗。

问：这个风俗一直传到现在，从来没有第四、六天给人家送东西的？

云：嗯。

问：生男孩和生女孩一样吗？

云：一样，这会儿有这么点那个，不叫多生，生女孩觉得也喜欢，生男孩欢喜，生两个女孩觉得不满意呗。

问：您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云：嗯。两个儿子，他哥不顶事，抽风，大脑坏了。

问：是不是羊角风啊？

春：小时开始有点儿抽风的症候，七八岁走道还走不结实。

问：是不是缺钙？大脑发育不好？是不是您怀孕时缺乏营养？

云：谁知道？闹不清，七八岁时还走不好。

问：那时也没看看去？

春：那时经济条件不行。

云：出去到刘家台 20 多里请个医生来，哪儿那么随便啊！咱这里没有医生。

问：过去是这样，现在呢？

云：现在有两个医生，赤脚医生。

春：刘占栓是给牲口治病，也给人瞧病。

问：现在有病，主要靠他们？

云：嗯。那时出去 30 里，找不到医生。

问：咱们村里这么多中草药，没有传下来老中医？民间有没有用草药、偏方、土方看病的？

云：没有那样的医生。咱们这药，都是刨走卖啦，没有这样的人才。

问：村里没有培养？

云：没有，只有赤脚医生，吃点洋药呗。

问：咱这儿上山采药吗？

云：采药就是卖。别处的来买，买就卖呗。

问：他们什么时间来收购药材？

云：不固定时间，刨下来人家就来收购。

问：您年轻时采药吗？

云：刨过药材。

问：那您从小是怎么认识药材的？

云：人家说这是柴胡，我就认识啦。

问：咱这里中药材很多，都有什么种类？

春：我给你们说说这些药材的名称：柴胡、远志、大红袍、知母、防风、穿山龙、芷根……

云：北京来的（指北农大学生）不认得药材，我刨了一掐掐，什么柴胡、大红袍、防风……

问：咱们这儿的老百姓知道柴胡治什么病吗？

春：知道是药材，不知道治什么病。

问：咱们吃这草药吗？

春：个人弄不行。

问：肚子疼、脑袋疼弄点草药煎煎吃吗？

春：弄点洋药呗。

问:过去呢?老辈子呢?

春:请外面的大夫开方子,去药铺拿药,回来熬。医生开方。

问:您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舍得送给舅舅,怎么想法?

云:她看着舅舅可怜,就去了呗。

问:凤英多大跟的她舅舅?

云:不太大,20多了,结婚时过去的。上学时她还在自己家里。

问:怎么商量的过继给她舅舅的?

春:这是怎么回事呢?听我告诉你们:正月三十晚上吃饺子,她舅舅那会儿没有她姥姥啦,就剩了爷儿俩。我说你去你姥爷家捏饺子去,后晌去了,也没吃后晌饭,也没捏饺子,说不吃了。丫头回来告诉说,我姥爷家别说吃饺子,饭都不吃了,我得伺候我姥爷去吧。她提出来的,给他们立门户去。我说,你要愿意,我们是盼不到,但是从俺们心里说,俺们不同意你去那里。她有这个孝心,愿意去,她个人主动要求伺候他们,过继给她舅舅,给他们立门户去了呗。

问:过继时,姥爷还活着?

云:活了几年。

春:她姥爷死了以后,这会儿和舅舅一起过。

问:(对云)您从小就在这村里,出过山吗?去过满城、保定吗?

云:去过。

问:什么时候去的?

云:有20多年了,文化大革命那年去的。晚上不敢出来,是婶子大娘家的,我不断地上那儿去。

问:家里种这点地,粮食够吃吗?

云:不够吃,地少。

问:今年收成不好?

云:旱得没东西啦,棒子、小麦就这么一点儿。

问:以前没吃过大米吧?

云：这会儿有了，那会没有。

问：买大米就这几年吧？

云：有十几年啦。

这时儿媳俊荣回来了，公公便离开，回到自己的房间。下面主要是和俊荣的谈话。刘俊荣，曾在刘凤英前担任村妇代会主任，今年 36 岁，初中毕业，为人豪爽干练。

荣：大米 1 块零 8 分钱 1 斤。

问：原来就是吃些棒子吧？

云：嗯。

荣：以前的生活简直是要不得。

云：就是要不得！就是点儿棒子呗，山药也少。

问：山药不是高产作物吗？

云：这里不怎么栽那个。

荣：这儿土质不行。

问：这儿就长棒子、高粱呢？

云：高粱也不怎么种。

问：咱这儿妇女都去赶集吗？

云：没买什么的，就是买点菜、布什么的。

问：集在哪儿？

云：龙塘。

问：这几儿是集？

云：一、六。

问：有卖什么的？

云：卖菜、卖布。

荣：外面卖东西的都过来，这里不纳税，也没人管。

问：这个集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荣:才有3年。

问:除了龙塘,其他地方有集吗?

荣:合起来咱这一片,在下面就是刘家台,还有岭西——那儿太远了。

问:大娘,您去赶集吗?

云:走不了多少,腿疼、腰疼,没怎么赶过集,都他们去。

问:您打多大岁数腰疼、腿疼?

荣:她脊椎脱节,拍过片子。

问:是不是腰间盘突出。

荣:嗯,就是腰间盘突出。

云:有不少年了。

荣:俺们村有好多人得这种病。

问:什么原因?

荣:不知道。俺们这儿有个赤脚医生,他自己就有这种病,也得住院。

问:得做手术?

荣:手术效果不好。俺们这有一个做手术的,做了又犯了。

问:咱们这妇女都得什么病?像这种病?

荣:妇女得这种病的少,一般男的多。妇女腰腿疼的多,是劳累的过。

云:那会儿早起上也上班去,白天也上班去,晌午给猪找草,挣分,挣工分吃饭。

问:您觉得是现在累还是那时候累?

云:分了(按:指土地承包)以后就不累了,抽空就弄点儿,灵活。那会儿,天天去,天天去,天天上班,没有几天不挣分的时候。

问:像俊荣她们这一拨儿的(即30多岁的)比你们累吗?

云:她们没赶上挣工分。

荣:我们赶上十年浩劫,拿着学习不当回事的时候。

问:现在男人出去了,妇女的负担也够重的吧?

荣:原先吃上饭就算解决问题了,这会儿,经济都把人压苦了。说实在的,这会儿负担特别重。原先把吃饭问题解决了就无忧无虑了,这会儿不是那么回事。

问:解决温饱后,还有更高的目标?

荣:总想着,有个黑白电视想买个彩电,从整个村来说,冰箱还没有适应进来,反正,是想把家庭条件改善好点儿,是吧?反正你得付出代价。

云:那时吃上饭就行,大家都一样。你看这会儿,这些区别,这会儿,一家和一家就不能比。说实在的,脑子好使的,就是相当的不一樣。

问:这也是竞争,是不是心理压力特别大?

荣:这会儿压力比先前大得多。从个人心理来说,谁也不甘心落后,理想达不到!但谁没个设想?谁都有点想法。相比之下,我到你家,挺像样;我一到我家,我一看我家,狗屁不如!从思想上想法改变吧,想法改变就得付出;不付出,想叫家改变样儿,完全不是那回事,相当累得慌。活得真累,真是累得慌!原先,有饱饭吃就算万事大吉,看这会儿?!

云:这会儿真是……

问:这会儿老年人挺知足的,虽然生活不太好,但和过去相比较,知足(读 ju 第三声)。现在年轻人压力大?

荣:这会儿的竞争和原先不一样,原先你工分多了,我也干;这会儿光将卖力气,费死劲儿,钱来不了。

云:这会儿挣点钱不容易?

荣:这会儿这事,孩子也不想落后,家里的事谁也不想拉在谁后头,肯定要付出;不付出一点儿也做不到。如果一个孩子考上了学,这后半辈子就给他掖(给他钱的意思)吧!

问:这会儿男的都外面挣钱去吧?

云：有挣多的，有挣少的？

荣：也不光挣多挣少，如果解决了温饱，粮食不用买了，就节约不少钱。这会儿，这地方，又要买米，又要买面，这点收入也就是吃饭。

云：供孩子上学。

问：还得盖房子。年头多了，还得重盖、重修吧？

荣：不修不行。比如我那会儿，房子就那么一点，撂上个沙发，两个人过来就得站着，就这么一点，不修房，这两个孩子加上大人，不修房怎么着？这点事压得你就得这么做！不这么做不行！

问：房子修完了，还有什么事？

云：孩子大了，就该上大学了。

荣：没个完！劲儿攒上，过到那会儿说那会儿！

问：一步步往前过吧。再过五年、十年，你就会盖上楼房啦！

荣：再过十年，你们上我这儿来还那样！我以后的事比盖房子的事还要重！

问：那时候，两个孩子都上大学啦！

荣：现实摆着啦。

问：慢慢还得发展。

荣：再发展就是这些人。

问：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荣：我担心我个人。如果我的身体能顶下来，这点困难没问题。我爱开玩笑，我说，要是我脚上长点儿毛病，没事；医生检查说我是失常窦性心动过速。好像不是器质上的毛病，心跳过速。犯病时上吐下泻，心跳，好像心脏要蹦出来一样。

问：平常吃些什么药？

荣：没有什么特效药。这种病，抢救过来就过来了，过不来就……大夫给我这个结论：你这病要好，可以到北京做个手术。我一听做个手术得花多少钱？我这经济能力，能负担得了？就这么呆着吧，反正犯了吃药打针过来还是那样。

问：多长时间犯一次？

荣：主要是别生气，别累。我明显记忆力减退，原先多少事都忘了。

问：（对云）大娘，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知道县长是谁吗？

云：不知道。

问：乡长呢？

云：不知道。

问：您参加过村里的选举吗？

云：参加过。

问：生产队选队长是一家去一个人还是都去？

云：一块儿去呗。

问：投票时，是一家一个代表？

云：嗯。

问：女的投票吗？还都是男的去？

荣：我们这选乡长都是代表选，选村支部都是党员。

问：选村长呢？

荣：选村长也是通过支部。

问：村长是行政领导，和选书记是两码事。

荣：从村来说，村民应参加选举，可是由始至终根本就没有。

问：村民选什么呢？就是选小队长？大爷当小队长，大娘您选谁？

云：俺不选他，俺选别人呗。

问：您是从心里选别人呢，还是不好意思选大爷？

云：从心里选别人。

问：为什么不愿意叫大爷当队长？（云笑而不答）

荣：我早就想，早晚要干点儿大事儿。他姑姑（指刘凤英）整天忙活村里这点儿事，没时间。我身体不好，心率失常。

问：吃药吗？

荣：现在不吃，医院的大夫说，经常吃药就没有多大效果了。

问：村里到外面打工的多吗？

荣：女的不多，都是小丫头们毕了业出去。

问：年轻的女的到外面打工，大家怎么看？

荣：也谈不出对年轻女的有什么看法。咱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发展前途，走出去见见世面，这地方把孩子们都憋傻了。出去让他们增长增长见识，完成学业，挣点钱，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问：年轻人愿意出去打工吗？

荣：你看看这地方这点环境，年轻人自然愿意出去打工。

问：女的是年轻的出去，男的呢？

荣：男的基本都出去。光家里这点地，他不出去挣点钱怎么过呀？男人出去打工的多，不去挣点钱连化肥都买不上，不想法挣点钱这日子真是不好过！

问：人们出去打工，连男带女回来有什么变化吗？从观念上和生活态度上？

荣：也就是看看外面，回来家里还这样，也就是挣点钱改善改善生活。

问：年轻女的打工回来会嫁给本村人吗？

荣：也有在本村的，也有嫁外面的。

问：男的打工和女的打工干的活不一样啊？

荣：男的出去搞建筑，没别的专长，卖苦力呗；女的在饭店或公共场所。总体来说，到了城里挺好的差事轮不上（笑）。

问：那村里怎么看待这些人呢？

荣：从村里说，外出打工的也比较多，再说打工也不走邪路。

问：那有没有在外面安家的？

荣：没有，打完工都回来。

问：都去什么地方打工？

荣：保定、满城，没去太远的地方。

问：也分季节吧？农忙的时候呢？

荣：农忙时男的都回来，干完就走。

问：男的在家干家务吗？

荣：也分脾性吧，有的愿意干点家务，有的懒，这个不一样。

问：怎么说男的和女的在挣钱方面和干的活上是有分工的？

荣：对，在这个地方，女的没有活动的范围，给限制死了。在家里干点活，孩子上学，其实负担也够重的，还搞点养殖。谁都想设法挣点钱。

问：一般谁当家呢？

荣：这个没有分工。

问：决定大的事情呢？比如盖房子？

荣：这个就随经济条件了，反正我觉得都有共同点，没共同点也不会搞起来，是吧？

问：现在咱们村里年轻人结婚谁决定？自由恋爱的多吗？

荣：基本上是自由恋爱的多，就是介绍人介绍也得男女双方都满意；男女双方不同意的也是完全不行了的了。

问：一般的还是有介绍人？

荣：一般的有，只不过是农村的一个过程。

问：有近亲结婚的吗？

荣：没有。

问：咱村里女的有没有嫁人的吗？

荣：有一个，最大也不到 30 岁吧，事业心挺强，在北京打工。谁知道干什么呀！一边上班一边学开车，想买北京户口，说将来在北京买上房子才结婚。

问：那大伙儿也不议论她吗？

荣：没人议论，从咱们来说，也羡慕人家事业心强。

问：现在结婚还给彩礼吗？

荣：这个也说不清（笑）。不一样。

问：咱村离婚的多吗？

荣：咱们村没有。即使有，也是极少极少。

问：那这极少数又是因为什么呢？

荣：家务事，还有外边……说不清的。人们感觉成个家不容易。这地方总体说靠男人生活。

问：我没感觉这儿女的靠男人生活呀？

荣：你没感觉出来，女同志也就是料理家务。

问：男的在外面打工，女的在家里养殖、种地，比起来还是男人挣得多吗？

荣：确实是男的挣得多。从我的感觉上女同志还是靠男人生活，女的生活不能自立，身体好的还行。从我亲身经历说就是靠男人生活(笑)。

问：你头一个生的是女孩？

荣：对。

问：那咱村里现在要是有两个都是女孩儿，有什么议论吗？

荣：没什么议论。

问：在男孩、女孩坐月子的伺候都一样吗？

荣：都一样。只不过我那时年岁大了，我24岁上有了松松，开始是个女孩，后来有了男孩。开始觉得要是个男孩就算了，再也不要了(笑)。大了以后，什么男孩女孩，有个女孩，将来还有个亲人！

问：老人有病谁照顾？

荣：子女照顾呗！

问：像你做媳妇的，比你丈夫照顾得多吧？

荣：那是。人家常年不在家。像我这个家吧，就是我累。我来了十五六年了，松松爷爷、奶奶连感冒也没得过，身体真好。我说，你们没给我增加负担，我倒给你们增加负担了。

问：关系处理得挺好的吧？

荣：我来了十几年了，没拌过嘴红过脸。总体上说我和凤英志向是有点一致，她的事业我比较支持。当初她去学剪裁，也是为了

学点技术维持生活,她把两个孩子都扔给我照顾。

问:你的两个孩子都是在村里生的?

荣:对,村里有大夫。像咱这地方很偏僻,没大事谁肯花好多钱?那时我那屋子你是没看到噢,比这小一半呢。这新房弄了4年才装修。为什么说我不称钱呢?我是从哪点能称钱呢?

问:他(指丈夫)挣的钱给你吧?

荣:多少给点吧。

问:那谁拿着钱过日子呢?

荣:他爷爷。你像咱农村这个风俗,怎么也得敬重一点老人。要是老人不想治理这个家还可以。老人现在身体很好就必须交钱。原先我个人搞点什么一概不交。他回来工资开多少交多少。

问:那也没想过分家?

荣:从进这个家就没想过分家(笑)。过大家庭过惯了,挺好的。

问:你当初坐月子有人伺候吗?

荣:有人,婆婆伺候。那时她在村里上班,一早一晚可以回家。

问:您能歇上多少天呢?

荣:那个都得歇一个月(笑)。

问:生以前没有检查吗?

荣:过去没有,现在有保健检查。

问:村里的大夫都是男的?

荣:是男的。

问:那他们有时也去接生?

荣:去。在家里能生谁也不去外边。总体说来也是经济状况造成的。

问:生以前知道是顺产?

荣:生以前都检查。

问:咱村这道儿是哪年修的?

荣:也没几年,七几年修的吧。

问：钱谁给的？

荣：交通局。从刘家台直接修到上边。修的时候咱们也没拨款，就是人们挣点工分。生产队组织人有点便利条件。这条道修得不容易。

问：这条道对咱村有益处吗？

荣：修成后方便多了。以前有急事到县城要走到高土庄上车，现在能在家门口上车。用水也方便多了，像爪髻那个村吧，麦子比较多，修了深水泵。西沟就没有麦子，东沟也没有。

问：那他们吃得上白面吗？

荣：买去。打工挣来的钱也就是维持生活。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人称不了钱？温饱还解决不了就称不了钱！

问：一般这一年中主食吃什么？

荣：玉米、麦子。

问：缺粮的时候呢？

荣：看着这一年收成不够就提前买点儿。

问：上哪儿买？

荣：卖粮的都送到家里，从面粉厂进货到咱这儿来卖。

问：咱们村有没有搞买卖的？

荣：咱们这少，龙塘的多。你看村的好坏，你看住房就看出来，日常生活显不出来，他们主要是秋天这一段收花椒真挣钱，到户里去收，人家有销路。

问：那平常吃肉吗？

荣：就过年时杀一头猪腌着吃。

问：那春节杀一头猪管一年呐？

荣：管一年。

问：您去赶集吗？

荣：龙塘那有集，就是村里卖菜的，有时间去玩玩，转转（笑）。

问：现在男孩女孩受教育有什么区别？

荣：没区别，当老人的希望都是一样的。

问：咱们村里像绘画、刺绣、剪纸这些有吗？

荣：这些没有。原来村里有个绣花厂，我那时孩子小、负担重，交货我跟着去。松松他姑姑（指刘凤英）是我的下届（村妇代会主任），她跟着去。那时真难，没有门路。那时没有管理经验，应该先把事情搞起来，有了效益在组织。那时没经验，把一个机会白白浪费掉了。

问：咱村里有什么娱乐活动？

荣：春节时搞点，平时不搞。

问：扭秧歌，还有什么？

荣：有爱唱的、爱跳的，没什么秩序。

问：有庙会吗？

荣：没有。

问：有信教的吗？

荣：没有，这里是老区，不信这个。

问：那咱们山里还有什么发展的优势吗？不好的方面有什么？

荣：反正这地方的条件也造就了。也许我的观点片面，我总感觉这地方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光靠养殖业不行，我不感兴趣。咱这地方没工业不行。种果树也不行，山上都是石头，土薄，缺水。你看咱这儿靠天吃饭，今年都旱死了！这不是我眼力浅。

问：这地方这么不好，姑娘们是不是都想嫁出去？

荣：村里有小伙子挺不错的，挺合适，也就不往外走了。

问：咱山里你觉得就没有可利用的东西？

荣：有什么可利用的？反正生在这地方了，也没什么好的可利用的。

问：年轻人还是想离开吗？

荣：想离开的还是挺多，这地方不吸引人。养小尾寒羊投资多，人辛苦。

问：山里会闹什么灾？比如今年闹旱灾，还有什么？

荣：雹灾、风灾都断不了。

问：庄稼也受害？

荣：哪年都受害。

问：也没有什么措施？

荣：也就是依靠自然条件呗！

问：现在在山上砍柴、挖药，觉得山上有什么变化吗？

荣：总体说绿化起来了，不像原先那么秃了。原先割柴割得光溜溜的，现在水土保持得好。

问：比原先割柴少是因为什么？

荣：现在烧点煤，庄稼好些烧点秸秆，这就绿化起来了。

问：山上有什么动物，见过吗？

荣：有小兔子，没别的。

问：吃的水呢？

荣：泉水。

问：浇地呢？

荣：天一早就是问题，现在下雨还好点。

问：咱这儿什么时候通的电？

荣：八几年，反正交通方便后电就通了。

问：电费贵吗？一度电多少钱？

荣：5毛多一度电。

问：平时用电除了生活还有生产用电吗？

荣：没有。